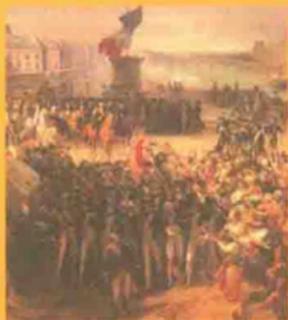




想象欧洲丛书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1848年欧洲革命

[英] 罗杰·普赖斯 (Roger Price) 著
郭侃俊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848年，一股前所未有的革命浪潮震撼了整个欧洲，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甚至没有经历革命的国家，如英国，也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危机。随后出现了反动保守化趋势，原有的精英统治阶层试图通过镇压革命并采取有限的改革措施，重新掌握政权，这种倒退对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同时分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诱发因素，将众多政治事件置于大背景下进行论述，这一大背景就是：一个正在持续经历从本质上的前工业社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向更现代的城市工业化体系过渡的社会环境。而且1848年之后，除了在战争情况下，政府仍可以有效地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本书对其中的原因也做了探讨。

上架建议：历史



培文微信

ISBN 978-7-301-24099-1



9 787301 240991 >

定价：26.00元



想象欧洲丛书

1848年欧洲革命

[英] 罗杰·普赖斯 (Roger Price) 著

郭佩俊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25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48年欧洲革命 / (英) 普赖斯 (Price, R.) 著; 郭侃俊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5

(想象欧洲丛书)

ISBN 978-7-301-24099-1

I. ① 1… II. ① 普… ② 郭… III. ① 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 IV.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204 号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 Roger Price, 1988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by Roger Price.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Palgrave Macmillan 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出版发行。

书 名：1848年欧洲革命

著作责任者：[英] 罗杰·普赖斯 (Roger Price) 著 郭侃俊 译

出版 统 筹：高秀芹

责任 编 辑：苑海波

标准 书 号：ISBN 978-7-301-24099-1/K·1038

出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 信 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960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89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编者的话

如今，在一些日益专门化的历史研究领域里涌现出蔚为可观的研究和著作，而本系列研究丛书就是为了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在丛书中，16世纪以来欧洲历史中的“热点”主题和事件将由那些深入参与到讨论之中的人言简意赅地呈现给读者。

虽然每部著作中都列出了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细目，可使学者和一般读者迅速了解该领域的核心出版物，但本系列丛书并非是为了论述扩展书目。原因是，每部书的讨论都限定于历史学者眼中的核心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和结论。本系列丛书意图向学生介绍一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通常需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沉淀到教科书和学校教学之中。我希望，历史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孜孜以求、有所斩获时的激动之情能够在丛书中展现出来，如同科学家们有了新发现时那样。为了让世人了解历史学者们在

做些什么，也为了让历史学更开放、更平易近人，本系列丛书会不遗余力。历史学若要世代相传，就必须传情达意，而不能自顾闭门造车。

R. J. Overy

关于注释

注释放在方括号中，与总书目中的号码对应。必要时，冒号后面紧跟着页码。注释中出现一部以上的参考书时，则会用逗号加以区分。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关于注释 / 4

引 言 / 1

第一章 社会体制 / 7

第二章 1848 年革命的背景原因 / 17

第三章 “革命” 运动 / 37

第四章 论革命的局限性：革命后的冲突 / 49

第五章 反革命 / 105

第六章 结 论 / 119

参考书目 / 128

地图 / 144

引 言

1848年，一股革命浪潮席卷欧洲，整个欧洲为之震撼。这一系列革命在规模和影响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革命之后，原有的精英统治阶层试图通过镇压革命、采取有限的改革措施，重新掌握政权。这些举动对正处在工业化过程的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世纪40年代末以来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一系列危机在革命前达到了顶峰。这些危机源于农业歉收，由于国际金融和工业危机而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疾病蔓延，失业人数不断增长，商业一蹶不振。

这本小书试图将这场错综复杂的、发生在多个层面的危机置于欧洲大陆的更长期的历史语境之中来描述，之前从1789年至1815年的法国革命和战争，以及随后出现的自由民主主义浪潮就已经让这个大陆处于惶惶不安之中。社会变革的步伐似乎越来越快，但结果复杂且不明朗。19世纪中叶的欧洲由众多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社会组成，正经历着从基本上处于工业化前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向更现代的城市工业体系的过渡。这些社会本身各不相同，因而它们经历的变革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有

所不同。因此，在分析它们差异性时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需要考虑不同民族国家各方面的差异，包括地理和气候（最大范围从北部的冻原到南部的地中海海岸）、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从英国到俄罗斯）、人口密度、所有制结构，还有农业（从以大庄园为主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和工业（从大工厂到手工作坊，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居住结构以及内部组织形式和对外联系方式（城市与零星分布的农村之间有很大不同）、文化和语言形式，还有政治体制（从君主立宪制到绝对君主制），以及民众表达不满的条件。以上这些因素都关乎我们对政治化过程和政治冲突的审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主要关注革命的起因、后续过程，以及迅速发展和反革命势力重新掌权的原因。除了对革命的分析之外，我们还将解释为何在这“革命之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局势仍然保持相对稳定。

无论是当时的学者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想要回避这些重大问题。他们的研究方式均受到其自身的现实关切和政治观所影响。尽管随着事件本身渐行渐远，出现了一些更加不带感情色彩的研究，然而仍然可以从中确定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立场的分析^[110]。历史学科的演变，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激起了一股对革命进行重新研究

的热潮。历史学家的探究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超越了传统上对狭义政治行为的关注，转而对政治现象的社会根源进行审视，并形成了具体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研究以便分析社会关系、权力结构、象征意义和语言 [30]。创新性地研究改进一开始籍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建立的研究方法与概念框架体系得以让历史学家更好地利用 1848 事件中急剧涌现的大量信息，反过来也可以使社会科学更好地理解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的各个社会体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考虑到我们将着手探讨一系列影响整个欧洲大陆的事件，关键问题的选择显然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一些选择标准，同样还要说明总体上所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的理由。在多大程度上的概括可以被接受？围绕一些概念或主题来组织撰写一本书的危险在于，不同的革命，尤其是发生在局部地区的事件将会丧失其独特性。然而，比较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它促使我们做出更多的分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1848 年的欧洲的确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共同隐忧” [15]。不仅如此，随着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逐渐相互影响和依存，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这为“导致起义暴动的因素超越了国界” [99] 的看法提供了依据，或许也证明了整个欧洲不同社会群体以

类似的方式趋于保守后退的举动。这些发展阶段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组织结构。

我并非想说存在一个简单的模型或理论，可以对1848年事件作出现成的解释。政治骚乱出现在极端不同的社会中。除了英国和比利时之外，工业化前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都保持着原有状态，并由于恶劣的交通条件和隔绝的地理环境而进一步强化。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农奴制和绝对君主制仍然盛行。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哈布斯堡王朝内包括王国、大公国、公爵领地、郡县等二十个地区，多数都有它们各自的“政治集团”，各地区之间的主要经济、社会和语言差异也非常明显。在更小的范围上说也是如此。经济结构、社会组织、交通方式和政治体系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政治观念和活动的形式。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理解政治行为对应的社会背景，同时提醒我们自己，不可贪图简单省事，笼统地概括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

第一章

社 会 体 制

沉湎于戏剧性政治事件的历史学家总是将 1789 年当成现代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似乎拥有充分的理由。对法国君主制、贵族和教会的攻击，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以及 1815 年盟国成员确保革命不会再威胁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决心，这些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尽管如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变化的步伐仍很缓慢，即使在法国也是如此。在 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的人口仍然主要分布在农村。只有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产业工人占据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或者略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只是在小作坊里做工。即使在英国，也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口受雇于工厂。糟糕的交通和零散的市场，再加上低微的收入和购买力，限制了大规模的、统一的市场的发展。出于同样的原因，工业发展仍高度依赖于当地的原材料来源——使用水轮机，而不是蒸汽机作为动力来源，使用木材而不是煤炭作为燃料。工业生产经常分散在农村，以利用农村中无业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与农村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而，变革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商人们安排原

材料和工厂订单“发放”的商业中心，他们将原材料和订货单发放到农村偏僻地区，在那些地区人口的过剩以及季节性的失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储备。近些年来，人们趋于把这一发展时期看做欧洲经济史上一个独特的“原始工业”阶段。同时，在现有交通网络中某些城镇所处的中心地位，以及这种中心地位给原材料供应和广阔的市场提供的通道刺激了更大规模工厂生产的发展。更具特色的是小企业联合体，它们生产全方位的商品，从富人的奢侈品到衣服、面包等生活必需品，从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众多的作坊为技术娴熟、待遇相对较高的工匠提供了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城市也收容了大量没什么技术特长的工人——街头商贩、搬运工、码头工人、普通劳力者——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处于一种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之中。马克思借用了那不勒斯词语 *lazzaroni*（流浪者）来形容这个阶层，并创造出了他自己的称呼——流氓无产阶级。

除了少数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心以外，大多数城镇仍然保留了工业化前的经济结构和中世纪时期的风貌。甚至连欧洲各国的首都、1848年革命的主要中心城市都是如此。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大量极度贫困的人群聚居在肮脏拥挤的场所，使这些城市不堪重负。甚至在市中心的外围，给新工厂建设留出空地的新兴的城郊，也建

造了新的贫民窟，只付得起最低租金的工人拥挤地住在仓促建造的住房里。

尽管存在着这些重要的持续存在的因素，工厂仍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与机械化生产同时，工厂也在英国率先出现，促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至少从17世纪就开始的相对较大规模的综合市场的逐渐发展。而这种综合市场的形成原因则在于可以通过众多内河航道和海上通道抵达英伦岛的大部分地区，也由于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和易于获取的自然资源。其他欧洲人则以一种害怕而又迷恋的复杂心态看待英国。他们经常谴责英国给产业劳动大军提供的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部分原因在于担心这可能导致反抗。尽管如此，新的技术还是被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似乎是唯一的手段，可以避免英国强大的竞争力给本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并可以提供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

机械化生产的增长给当时的手工制造业带来的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直接影响之处在于，机器开始代替手工劳动，特别是在纺织行业，时不时会引起破坏机器和暴动的行为，例如1844年西里西亚工人暴动。而那些控制了原材料供应和手工作坊产成品进入市场的渠道的批发商，他们同样也控制关键的信贷服务，不断地对供应商施加压力，迫使其降低成本，间接影响了手

工制造业的发展。结果就是迫使他们对工作流程进行重新组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加强手工作坊内的劳动分工。这些趋势不仅会减少技术熟练工人的收入，而且会造成他们“手艺”的贬值。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使那些较为雄心勃勃地想成立自己的作坊的工匠实现其理想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这些发展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作坊内部、作坊主和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威胁到某些特定行业的生存，也对整个地区的繁荣构成了威胁。地图 2 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经济结构变化在地域空间上的特征印象。显然，并非所有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制造业扩张的地区都拥有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自然资源。随着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地区，通常是在农村，工业生产能力减弱。早期在纺织、采矿、冶金和工程领域的工业化中心，（看起来就像）是被广大农村的海洋包围的孤岛。

从其他一些重要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古代政权成功地存活到了 19 世纪。即使在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例如法国，君主仍然保留了很多实质性的权威，因为精英们认为这对维护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再往东去，绝对君主制仍在继续发威，只有习俗、区域特权及实际现状（弱小的官僚机构、有限的收入、糟糕的交通，等等）等力量对其施加限制。

此外，贵族地主仍维持着社会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即使在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虽然在那里，借助财富并采取适当生活方式，成功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可以担任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职位。再往东去，贵族占据着更彻底的统治地位，这实际上受到绝对君主制体制的保护。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极少数人占据着与其比例极不相称的绝大多数财富，他们能够控制稀有资源（尤其是土地）、就业以及慈善机构（学校、医院等）。由于他们事实上垄断了议会、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关键职位，他们主导了立法过程，控制着国家强制力量，也就拥有了行使权力的多方面手段。正如地图 7 所暗示的那样，在西欧，地主权力以出租农场为基础；在中东欧，地主权力通过残存的封建关系得到了加强。即使在以自耕农为主的地区，通常仍有少数更大的地主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半封建封地制度和农奴制在德国东部，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大多数地区，在俄罗斯以及多瑙河流域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程度不一地盛行。在普鲁士，农奴获得了解放，其条件允许少数富裕农民出现，其代价却是让农村大部分人口陷于少地或无地的状态。这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给地主当长工，这些地主保持着对当地政府部门和警察力量的控制，他们几乎不用缴纳任何税负，当然，假如他们很愿意，也可能在“他们的”农民需要之时

提供些微的帮助。在东部的其他地区，大多数农民只享有土地的用益权，也就是说，在获得使用权的同时，必须提供义务劳动作为回报（通常一周3~4天，在收获季节则时间更长），并缴纳其他赋税。这些赋税在理论上补偿了地主们履行司法和警察职能时的开支，尽管这些职能实际上大大加强了地主的权力^[2]。农民在为地主干活时会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体力，以便更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虽然地主们常常意识到这种体制的不足之处，但他们担心一旦改变会威胁到整个社会体制的稳定。

在英格兰南部、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东北部，已经形成了密集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混合型农业。除此以外，大部分地区农业耕作方式依然落后，产量低，易受不利的气候条件影响。在这个工业和商业无法创造足够多的新增就业机会的时期，人口的持续增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竞争数量有限的工作岗位，如农业劳工，或者在乡镇企业工作，或者租用和购买农场。

这种增长强化了那些控制着稀有资源的人的权力，使得他们能够强行压低工资，提高租金和土地价格。穷人被迫无条件接受并忍受这种依赖关系，而富人则通常会装出一副是他们自愿接受这种关系的样子。而且，在传统的家长式意识形态中，至少会对处于极端贫困不幸

的人提供了一些救助，这种形态也正在消亡。交通的逐步改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货币化促使地主、大农场主和较富裕的农民利用多种手段更有效地利用土地，比如圈地，或者限制农民进入森林寻找柴火或进入牧场的传统权利，而这往往是贫苦农民赖以生存之根本。

虽然现代社会评论家往往侧重于关注工业增长和城市过度拥挤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农村人口过剩所造成的困难也不应该被低估。尽管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但是大多数农村人口甚至在收成很好的年景仍生活在贫困之中，当遇到荒年时，他们就会沦落到不幸甚至饥荒的境地。

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发生动荡不足为奇。19世纪40年代在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森发生了多起重大的农民暴动，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1846年2月至3月发生在加利西亚的农民暴动，数百个波兰贵族家庭被屠杀。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害怕遭到镇压，这种宣泄不满的行动受到抑制。而且，混合了世俗和宗教观念的意识形态也为社会等级划分现象进行辩护，世俗和宗教二者一起，构建了一种普遍而保守的社会文化。就像1803年普鲁士教育法令所做出的典型规定那样，“工人阶级的孩子必须被教育学会阅读教义问答集、圣经和赞

美诗的书；让他们学会敬畏和热爱上帝，根据上帝的旨意行事；学会敬重权威。”事实上，相对而言，精英们的表达能力更强，拥有更优越的组织和发挥影响力的手段，这意味着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不必要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地位，尽管威胁始终存在 [101]。

这就是 1815 年以后几十年内的实情。认为革命会再次爆发的担忧似乎被 1830 年发生的事件所证实。当时，在法国，由于经济危机和广泛的社会动荡，再加上查理十世拒绝考虑民主改革并决定采取政治镇压，引发了抗议，抗议导致示威者和巴黎的治安力量发生冲突，最终导致政府的垮台和革命的发生。这些事件激发了其他地区的抗议浪潮——最主要的是在荷兰南部，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偏向荷兰人的税收和关税结构，以及政府的教育和语言政策非常不满，引起反抗，并且——在法国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利时王国。在德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波兰，也发生了大范围的骚乱，其中波兰掀起了反抗俄罗斯统治的浪潮，最终遭到残酷的镇压。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南部诸州，统治阶级对民众的自由诉求作出了让步。其结果就是，赋予那些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选举权，并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都加强了议会的权力。这些做法体现了各国政府试图将财产拥有者（通常指那

些缴纳数量极少的直接税赋的地主)纳入政治体系之中,从而加强社会稳定性。大多数人仍然被排除在外,因为她们是女性,或者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既无物质倚靠,也不曾受过据认为在政治决策过程担当负责任、有学识并且理性的角色所必需的教育。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在欧洲大陆)富人可以豁免的兵役,以及对公民自由持续的限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根本上的不平等。作为1830年事件之后续,1832年8月出版的教皇通谕(Mirari Vos)体现了普遍所持的保守观点,将新闻出版自由称为“致命的自由”,并警告说:“这个国家已经在这一纯属邪恶而不受约束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对新奇事物的爱好之中死去。”^[9, 109]

尽管存在诸多限制,改革仍然体现了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变化的承认。商业化、城市化、官僚部门的发展和工业生产的延伸相结合,增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数量,也使他们更为自负。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向现代经济的过渡足够充分,能够给众多穷人的生活境况带来实质性的改善,而这本可以借此缓和他们的不满情绪。人口对农业资源造成的压力,农村工业的衰退,和工业化早期的激烈竞争性结合在一起,制造了大范围的悲惨景象,有产阶层则越来越担心会发生社会动荡。这就是1848年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

第二章

1848 年革命的背景原因

要分析革命的原因必然会谈到它自身特定的问题。相关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结构、较短一段时期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政治派别对立的存在，以及政府应对这种对立的能力。革命的发生与否——只能放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体系背景之中来理解。此外，尽管对原因变量的分类是一种必要的分析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所作的区分都是武断的、人为的。权衡每个因素的重要性极其困难。在多数时候，政治学家们努力作出的理论阐释不过是同义反复和过度简单化。首先，将革命的背景因素，即前提条件，与革命过程中实际的推动因素进行区分，可能会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在这里，记住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几乎没有人真正想要或期望革命。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政治活跃分子来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真实记忆和虚构的故事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量，防止他们跨越“正常的”政治活动之雷池一步。为了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地方的原有政权相继垮台，我们不能利用事后聪明的做法，而是要极富想象力地返身一跃，跳回到过去的时代，去努力理解历史过程中众多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我们既要将革命看做一起政治事件，又必须把它看做一个社会发展过程。

1848年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政治困境同时出现。先前存在的社会紧张局势在危机中进一步加剧。人们开始质疑现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政府在应对脱贫、维护法律和秩序等迫在眉睫的问题时明显无能，而且他们在审查制度、选举权、议会权力等问题上仍然不肯让步。随着这种质疑的出现，上层社会精英之间的政策分歧以及对自由化的诉求更显得迫切。这样的形势容易引发骚乱。但是要让骚乱就此变成革命，“需要有一些触发事件，尽管说，一旦有一个政府垮台，统治阶层中显然存在的普遍的信心缺失有可能会造成损失。

很显然，始于1845年的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蔓延大大加剧了因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从大多数方面看，这场危机都具有欧内斯特·拉布鲁斯^[14]所描述的那些古代政权经济的典型特征。1845年及1846年谷物收成不佳，以及马铃薯晚疫病造成的影响，被缓慢而昂贵的交通、效率低下的信息传播、保持区域和国际供应平衡时遇到的困难，消费者的恐慌抢购与商人的投机炒作而放大^[60]。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食品价格都大幅上涨——在某些地区经常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给本已经历一个周期性下滑的商业、金融和工业活动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影响。

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对众多本来就生活在低水平状态的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造成了威胁。而且，随着他们将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购置食品，在工业产品方面的支出有所下降，结果，在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城市和农村工业的失业率也开始上升。为支持食品进口而出现的黄金外流以及提高利率水平造成了通货紧缩，加上在繁荣时期被投资到欧洲大陆铁路和工业发展 [47, 75, 77] 中的英国资本的回流加剧了这场危机。这种信贷紧缩给很多商人造成了流动性危机，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增添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在转型经济中，前工业阶段的生存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由于生产过剩 / 消费不足危机的蔓延而变得前所未有地严重，而生产过剩 / 消费不足更像是工业化经济的典型特征。

这场危机对不同社会、不同地域的影响必然有所不同。在英伦三岛，1845年的谷物收成属于中等水平，在1846年则还凑合，不算太坏。而且，由于其经济相对发达，积极参与海外贸易，以及对进口食物一贯的依赖，英国完全有能力争取更多的粮食供给以度过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仍然遭受到马铃薯晚疫病的全面影响，超过50万人死于饥饿或与饥荒有关的疾病，这愈发让人觉得不可饶恕。皮尔 (Peel) 的救济措施推出不久就

被辉格党人驳回，该措施本身也根本不足以缓解大范围蔓延的危机。辉格党人深受自由经济理论影响，该理论主张自由食品市场可以有效运行，同时还认为，政府干涉只会导致财政预算不足，而且更糟糕之处在于，它会助长爱尔兰人“天生的”挥霍无度。民众普遍对爱尔兰的问题缺乏了解，实际上，只有官员们关心爱尔兰以及爱尔兰移民的骚乱对英国本岛的威胁，民众对于和他们的生活鲜有直接影响的事件几乎没有兴趣。然而，英国本岛也受到日趋恶化的失业问题的困扰。在1847年3月，对曼彻斯特的179家工厂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标准意义上的40000劳动力中，19000人处于做短工或失业状态。尽管如此，在纺织业除外的其他行业，由于受到铁路建设的反经济周期性影响，经济危机并没有显得出乎意料地严重——从危机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来看，它不如1840年2月那一次来得严重。1848年革命之后出现的大萧条造成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影响^[157]。在东部，在俄罗斯和波兰的部分地区，粮食作物收成也相当不错。而爱尔兰、比利时的佛兰德地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和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则似乎处于各自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状况之中。

如果说在所有地方都是非熟练工人和无产者所受苦难最深重，那么他们的苦难程度随着众多复杂因素而表

现各异，包括：很显然地，当地人口密度和农业生产力、商人对当地物资短缺的反应能力、土地所有权结构和就业机会的属性，以及当地官员和精英人士采取救济措施的意愿和能力等 [58, 59]。

人道主义，以及防止混乱的愿望促使他们出台救济措施。但措施的力度规模不足以避免社会紧张程度的加剧，而后者不断地以罢工、游行、犯罪率上升和粮食暴动 [60, 75, 92, 127] 等形式出现，比如所谓的“土豆暴动”——1847年4月在柏林发生的持续三天的暴动和对食品商店的攻击。虽然事件本身并不可能导致发生革命，但是这种危机在民众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感，他们认为政府有责任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他们之中有饥饿和失业的人，受破产威胁的商人，担心由于债务而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骚乱和无秩序吓坏了的人。普鲁士驻卡塞尔代表加伦伯爵 (Count Galen) 在1847年1月20日写了如下文字，表达了他的不适感：“旧的一年在物资匮乏中结束，新的一年在饥饿中来临。精神和肉体的苦难，像鬼魂一样穿越欧洲——一个没有上帝，另一个没有面包。如果它们联手，那将是多么可怕的灾难！”虽然自1847年秋季丰收后，所有条件似乎趋于改善，但是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负债面扩大，不安全感加剧。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真正

的危险，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政治化。它的发生原因有很多 [28]。

就苦难本身而言，它并不会直接或必然导致政治动荡。实际上，在那些处于前所未有的糟糕境地的区域，如爱尔兰，处于饥饿之中的民众尚有更紧迫的问题——对英国统治的憎恨大大地增强，尽管这应从更长远意义上来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中，尽管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困难与不满情绪的出现并非毫无关系，然而只有当它成为各方关注的政治焦点时，才会对现有政权构成危险。即使到了那一时刻，也可能会因为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以及对宣泄不满的方式的可行性构想而采取不同的行动。

似乎中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加剧才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便于煽动更广泛的资产阶级各界参与和民众的支持。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们主要通过自由主义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这种自由主义信条根据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不同而会有很大的变化，并经常表现为对英国模式的“现代化”的向往。他们的目标包括通过削减国王和教会这些传统机构的权力，来结束独裁政府统治，并发展议会政府来更广泛地分享政治权力，同时保障个人自由，以法治国。总体上来看，自由主义者拒绝民主，反对让那些被认为可能制造无政府

状态的人来治理国家，而赞成让那些在社会上拥有实际财产的人，即有产者来统治管理，据认为这样可以保证统治者采取理性的、负责任的政治行为。他们肯定不提倡通过革命手段来进行政治变革 [46, 101, 119, 122]。

所要求的改革，以及采用的策略，会由于政治活动家发现自身所处的不同形势而各不相同。反对派系之间的政客在改革重点和改革目标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大差异。在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高层和部分中等权力位置，中产阶级已经被给予了选举权，尽管传统的贵族精英仍然在政府中占据着显要位置。只有在法国会发生革命。再往东，在普鲁士，贵族的优势更加明显，在 1842 年，贵族占据了 11 个内阁部长中的 9 个，加上 28 个省级领导中的 20 个 [9]。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公务员、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以及商人认为被轻视，对他们所见的历届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做法表示愤慨。在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代表和广大工人与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主要由零售店主和作坊主构成的较底层的中产阶级，他们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经常关心那些上层社会人士所关注的政治问题，同时又具有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众多不安全感。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贫困现象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

已经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它表明了社会危机感的日益加剧。在众多官方和私人调查中，以及在法国人路易·布朗(Blanc)、埃蒂耶纳·卡贝(Cabet)、皮埃尔·勒鲁(Leroux)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roudhon)，或德国人威廉·魏特林(Weitling)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魏特林提出的众多口号，包括“解放工人阶级”和“成立劳工组织”，被少数拥有熟练技术的、有文化的工人，特别是城镇工人所接受并讨论。在中欧这些工人已经形成行会组织结构，在法国，他们更是受益于自革命前延续而来的传统的协会组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期待着能有一天，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社，他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社会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现存的手工艺人社团机构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休戚与共思想，而这正是手工匠人表达不满的依托。那些受雇于工厂或充当一般劳工的、没什么技术特长的工人——这些人通常刚刚来到中心都市——在这个工业发展的过渡阶段，在总体上缺乏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由于物质和文化上的贫乏，他们对于民主或社会主义理想没什么兴趣。只有在英国，由于其工人阶级组织存在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有一群更广泛的、但仍只具有有限的代表性的工人，他们被吸引加入到宪章运动之中，借此表达他们对无序竞争、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来

自济贫院的威胁、无处不在的政治无力感的不满 [45, 61, 88, 164]。

在 1846—1847 年这样充满强烈危机的形势下，几乎不用怀疑，凡是看起来政府没有对各种不满作出回应的地方，对政府政策进行的抗议和抵制活动就会更加普遍，而且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的范围也在显著扩大。在法国，包括王权支持者在内的各种反对团体，对 1846 年的选举结果表示失望，因为他们持续被排除在公职之外，没有官职任命权。他们和其他更坚定的共和派成员一起施压，要求将选举权扩大（至交纳 200 法郎直接税的人以外），也就是说，他们试图改变政治游戏规则，这是他们可能获得权力的唯一手段。

他们于 1847 年 7 月聚集在一起，计划发起一场支持改革的运动，并通过假装举办联谊会的形式，成功地规避了禁止政治集会的法律规定。政府的持续不妥协只会激化这一运动，让共和党人变得更加激进，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就是勒德律—罗兰 (Ledru-Rollin)。他主张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在奥迪隆·巴罗 (Odilon Barrot) 等查理王朝的反对者的经费支持下，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运动计划在 1848 年 2 月 22 日在巴黎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宴会，希望借此达到运动的顶峰，然而正是官方力图阻止这个聚会的努力，直接导致了革命的发

生 [55, 71]。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于 1840 年就任后，放宽了对出版物的审查，并设立了一个由省级议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他们每两年在柏林开一次会，以便给国王提供建议。这些举措鼓励了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莱茵兰 (Rheinland, 莱茵河西部地区)，通过汉泽曼 (Hanse mann)、坎普豪森 (Camphausen) 和梅菲森 (Mevis sen) 等代表之口，要求建立立宪制政权。拥有 10 万居民的科隆和亚琛在莱茵议会中只有 3 个代表席位，而 7000 名贵族却有 25 个代表席位，而且在整个普鲁士国家议会中，贵族代表是资产阶级代表的两倍，这些事实令人越来越无法接受。富有的非贵族们急于争取更有效的代表权，能够代表他们在税收和关税方面的利益，并减少政府当局对其事务的干预。专业人士抱怨政府对贵族的偏心，因为他们发现，尽管他们受过大学教育，能够胜任相关职位，但他们却很难得到这些职位。更普遍的是，政府官员的恣意妄为和残暴行径使人们日益不满，他们希望加强法治，成立一个 *Rechtsstaat* (法治国，即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在审查制度方面，人们常常通过秘密出版和偷运非法材料等手段，同时使用“伊索式”语言——伪装成文学或社会评论的隐晦暗指和政治批评——来规避限制。压制只会让人们产生极大

的不满，根本无法遏制日益增长的抗议浪潮 [122]。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在革命年代，一贯以来的忠诚会逐渐瓦解”的影响 [119]，在巴伐利亚州地区的巴登（Baden）、符腾堡（Württemberg）和汉诺威（Hanover）的部分地区，以及普鲁士的西部诸省——尤其是莱茵兰，对自由的渴望尤其强烈。在这里，维护本省特有的制度，包括自法国统治时期遗留至今的民法典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利益的愿望，加上日益自信的资产阶级对中央集权的普鲁士当局的不满，两者结合在一起，要求统治当局以1830年法国宪法为原型，建立君主立宪制，让富人享有选举权。然而，这个自由运动的领导人，如科隆的坎普豪森和梅菲森，也意识到保持与普鲁士的联系所产生的政治优势，以及作为关税同盟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一场温和的宪法改革，以及朝着更大的德国统一体的方向迈进一步 [122]。

在德国，反对派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气候。随后出现的地区主义和本土主义大大地削弱了自由和民主运动的发展。但在1846年和1847年间，人们对政治的兴趣明显在增长，这一点，从众多提供政治辩论舞台和政治组织培训的社会俱乐部和专业协会的成立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使得许多公务员、律师、大学教授和记者，以及为数不小的商人，能够借

此而声名鹊起。这些人的职责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地位，他们享受财富带来的休闲，喜欢公开演讲的训练，这是经典教育的一部分。他们将自己的行为看成是理性精神的表现，代表着与自私的既得利益相冲突的未来力量。他们确信，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渐渐地，他们的思想顺着社会阶层向下传播开去，被中产阶级下层和技术工人所认同并接受 [104]。

主要通过这种方式，少数临时技工开始对一些自由的、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的思想有了初步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传统行业公会，或者属于稍晚一些的互助社团和工人教育协会 (*Arbeiterbildungsvereine*)。然而，在当时盛行的工业化前期特有的形势下，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通过加强行业公会的特权，从而保存现有的制造业免受工业化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 [88, 112]。

在3月前期（即从1815年至1848年3月份前这一时期），在“自由派”政治反对力量推动的这场并未有统一组织的运动中，这些典型的支持者远远没有在基本原则上一致，这一点从他们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可以明显看出来。有些人坚决指责“无能”的穷人要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并认为这只能通过快速的经济现代化与道德教育来缓和，道德教育可以防止因“性工作许

可”、酗酒、犯罪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增长而明显出现的社会秩序的瓦解。更多的人则持同情心态，希望保护若小的独立手工艺人和农民的利益，免遭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盘剥。少数持激进主张的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甚至准备支持诸如义务教育和累进所得税这样的措施。然而，即使在1848年前，形势也已经很明显，普遍的动乱让许多自由主义者在事件中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并试图将政府看做保护力量之源。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种矛盾，他指出，类似汉斯曼和坎普豪森这样富有而想要自由的商人害怕促成这样一种局面——“暴动的下层民众变得蛮横无耻，抢劫一切” [88]。

在普鲁士，国王在1847年召开了议会的联席会议，这是面对这些复杂压力作出的一种妥协，同时也企图借此筹措借款，但并未成功。虽然它原本只是作为一个协商会议，但它提供了一个表达不满、阐述宪法国家理念的平台。结果它很快就被国王解散。和他的贵族顾问们一样，国王坚持认为，必须维持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王权，而且其权力应至高无上，只是出于对法律、对传统的秩序与合作的自主性和优先权的尊重而有所限制。他们呼吁传统的、既定秩序的合法性，并警告说可能会发生另一个1789事件。但是，议会会议的本质和它的发展倾向只是增加了民众的不满 [89, 95]。

在奥地利帝国也发生了类似的骚乱。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如政府官员——艾德里安-沃伯格男爵——在《奥地利与它的未来》(*Austria and its Future*) (1842年)上匿名发表的文章，或者是那些刊登在《模子》(*Grenzboten*)——一份在莱比锡印刷并偷偷越过边界进入奥地利的报纸——上的作品，批评效率低下的官僚制度、审查制度、税收体系、决策上的中央集权以及对贵族的偏袒。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在维也纳的集会场所参与对改革的讨论，如吸引了众多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参与的法律—政治读书俱乐部，成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论坛的协和社团，当然还有下奥地利州的制造商协会。到1847年，这些组织举行联合会议，讨论修改宪法。由于维也纳发展成了行政、金融、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当然也造就了日益自信的资产阶级分子。下奥地利州的各政治团体，进一步要求废除残留至今的封建税赋，并采取措施，减轻贫困。同时，许多贵族对于少数保守的宫廷贵族操纵决策过程、而自己被排除在外表示不满 [89, 143]。更为错综复杂的是，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这些心思各异的反对力量与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尤其在匈牙利，是由于贵族的支持鼓励所致。他们呼吁恢复历史上曾有的地方权利，希望借此重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威。但

是，这样的结合也表明，民众对帝国越来越明显的日耳曼特征表现出广泛的不满。民族主义情绪在滋长，尤其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最初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传播，渐渐地发展成一场更为广泛参与的、反对政治统治的运动，主张在社会、文化和语言方面的民族优势，经济上要求平等竞争。而对于德国人而言，世纪之交法国的统治威胁刺激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但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德国人被看做在争夺霸权，虽然马扎尔人本身也在努力争取获得对不同语言族群的控制，包括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见地图5）。不同族群之间多个世纪以来的复杂混居，在1848年产生了重大的政治意义^[3]。在波希米亚，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基本上都使用德语或被德语同化，那里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蔓延和深化，新兴思想从城里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阶层传播到小商人和工匠之中，进而传到那些交通较方便、商业较活跃的农村地区的富裕农民中——这种扩散的过程表明了交通和文化接触的重要性^[142]。然而，19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夸大了这种情感的力量。1848年之前，只有一小撮人热衷于改变他们所属民族的政治地位，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受到诸多限制，如审查制度、与群众缺乏接触同时本身又担心引起无政府主义情绪等。即便如此，这些少数人物，

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仍然具有潜在的重大影响力。

渐渐地，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诸地方州，民族团结被宣称是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这种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在德国最为明显，在1815年成立了德意志联邦，联邦议会设在法兰克福，让德国具有了有限的国家意义，然而与此同时，又重申了该国39个州的独立性^[122]。在意大利，尽管被奥地利占领了伦巴第和威尼斯，它的本土主义似乎更为根深蒂固。马志尼(Mazzini)是极少数支持成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和暴力革命的人物之一。此外，在这些被奥地利直接控制或者统治的地区，贵族和非贵族地主、在诸如米兰这样的都市中的城市贵族、还有富有的专业人士和商人组成的社会精英感到自身被外国人控制的政府排除在权力之外，很不公平。而且，受过教育的人士对审查制度也感到不满，它把但丁、薄伽丘、雨果、歌德的书籍驱逐出了大学校园；商人们则反对旨在迎合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厂商的经济政策。即使是神职人员——尤其是那些在农村有影响力的人员——也反对奥地利干涉教会事务。在日益增长的对立中，这些团体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尽管如此，19世纪20年代的起义行动的失败，让加富尔(Cavour)等人所信奉的温和方式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他们主张根据英国或法国的方式实施经济和政治

现代化。1846年6月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当选,随后大赦2000名政治犯,并放宽了审查制度,这极大地刺激了意大利半岛各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托斯卡纳(Tuscany)和皮埃蒙特(Piedmont)政府感到有必要作出类似的让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在教皇主持下成立意大利各州联合政府的想法。这些事态的发展让保守派感到震惊,事实上,变革的步伐以及更激进更民主的政治团体的出现,加上与奥地利交战的可能,吓坏了许多温和派。即便如此,在伦巴第-威尼斯,中央和各行政区议会(教众)决定支持民主人士科伦蒂(Correnti)和曼宁(Manin)的请愿,敦请皇帝允许成立自治政府、争取公民自由。通过发起一场鼓励戒烟的运动,以减少奥地利税收,以此来支持这一请求。在米兰,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与军队之间的冲突,结果证明,这场冲突在强化群众的反奥情绪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1848年初,尽管在奥地利帝国辖区各地并没有什么关于革命的想法,但人们对政权的批评声音无处不在,并且越来越大,而中央政府的无所作为更是让批评越来越严重 [152, 156]。

事实表明,面对要求变革的压力,有些政权做出了积极主动的变化。在英国,在1848年之前的十年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主张进行民主改革的宣传,比如男性选举

权、无记名投票、支付国会议员报酬、选区平等、每年召开国会会议等。很多人逐渐开始相信，这样一种民主的建立会使社会发生变革。从民众支持的广泛性来说，在欧洲大陆没有什么可以与宪章运动相提并论。即便如此，英国的形势仍没有促成革命的出现。

非常显著的是，一系列有限的让步，特别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和1846年的《废除谷物法》，再加上宪章运动引起的对混乱和革命的恐惧，让中产阶级减少了对激进的政治手段的支持 [158, 164]。随着比利时在1847年自由选举的成功进行，选举权制度扩展到多个国家，并取得了类似结果。而在其他地方，如我们所见，政府都不太愿意妥协。贵族大臣们担心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一旦开启这扇让步的闸门，进一步的要求就会如潮水般涌来。在法国，1846年选举确立的政府机构让路易·菲利普和他的总理基佐 (Guizot) 颇为宽心，他们相当自信，认为抗议可以得到控制。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相信自己拥有天赋的神圣的统治特权，其顾问大臣们的表现让他更坚定了这一信念。实际上这些大臣均来自王室血统和贵族文武官员这一狭小范围。对个人和顾问意志的依赖是绝对君主制的一个根本弱点所在。这在奥地利更为明显，未曾受过良好教育并且长期患病的君主没有能力给他的部长们指明国家

前进的方向，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和内政部长科洛拉特（Kolowrat）一向彼此不和，既无法有效地应对日益严重的帝国财政状况，将它建立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之上，也无法应对要求改革的压力。因此，梅特涅虽然清楚意大利不断恶化的局势，还是没有同意总督费科蒙特（Fiquelmont）主张改革的建议，也没有对伦巴第大区的军事指挥官拉德斯基（Radetzky）作出适当的制约措施。拉德斯基有着典型的军事存在主义思想，他坚持认为，在1847年后期，“整个社会秩序……即将崩溃，只有通过军事恐怖手段才能控制革命”^[145]。因此，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现象只不过坚定了中央政府采取策略维持现状的决心。它已经与欧洲正在经历的迅猛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现实完全脱节。在这种形势下，统治精英普遍未能响应变革的要求，导致政治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此外，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多重危机相加，让那些一贯支持政府的人士也极大地丧失了信心，增加了众多政权体系崩溃的可能^[19]。

第三章

“革命”运动

1848年初，很显然地，在欧洲到处弥漫着不满情绪，但它本身并不足以引起一场革命。甚至没有人考虑会发生革命的可能。那么，为什么，在一些地区，政权统治阶层和它的某些臣民之间会发生冲突，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导致革命形势的出现，即政权更迭或出现重大社会变革？而且，为什么如此大范围的欧洲大陆受到影响？从出现革命的地理分布上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开始于首府城市——政治活动中心，也是经历快速的经济变化和人口增长的中心都市——随后才影响到其他城镇和农村地区。2月23日至24日巴黎革命的爆发显然是一个主要诱因，从方方面面加剧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助长了对立倾向。尽管如此，随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主要取决于当地和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

在巴黎，革命的爆发从本质上看并非是刻意策划的。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全国运动已计划在巴黎的第十二区举行大规模宴会，将活动推向高潮。然而，担心可能出现混乱，政府禁止了这场宴会。自由主义者和主张共和政体者中较温和的人士接受了禁令，但是激进者呼吁举行抗议示威，于是2月22日成群结队的学生和工人聚集在玛德琳教堂以及协和广场，并在这些地方发动了零

星的暴力事件。第二天，本质上属于中产阶级的国民警卫队（民兵）中的一些人明确表示支持改革，与那个似乎仅仅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表示疏离。

路易·菲利普的信心开始动摇，同意作出让步，并首先以更加开明、支持改革的莫尔（Mole）取代基佐担任总理。这个本质上不过只是装点门面的举措，在众多要求改革的中产阶级支持者当中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在一些较贫穷的区域中出现了少许路障。尽管如此，危机似乎正在消退，直到大约 23 日上午 10 点，在卡普西奈大街（Boulevard des Capucines）保护外交部的部队突然向示威者开火，他们显然没有接到命令，只是过于紧张。这一行为激起了民愤。如果说，在 2 月 23 日上午，巴黎贫困者阶层中尚只有少数人投身于共和运动，到了 24 日凌晨，民众构筑了大约 1500 个路障，反抗国王杀害臣民的大规模暴动一触即发。豪斯曼时代之前的巴黎街道狭窄而曲折，很容易被翻转的马车、油桶和铺路石堵塞，两侧高层建筑包围着街道，从中可以投掷石块器具等，政府军队将会丧失其训练有素和火力强大等诸多优势。

因残酷镇压 1834 年共和起义而臭名昭著的比戈元帅（Marshal Bugeaud），奉命前往镇压这场较之更加危险的运动。他命令 4 个纵队清理道路。然而，这些部队

未受过巷战训练，很难发挥威力。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他们往往容易士气低落。结果，在缺乏政府明确的指示，也没有期盼中的国民警卫队支持的情况下，比戈的行为很快失去了动力，他被迫撤回渐趋混乱的军队。这使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极为沮丧，以至于有人建议路易·菲利普退位，而王朝中的反对派成员，包括吉拉丹(Girardin)、梯也尔(Thiers)和巴罗等人为了避免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试图建立由国王的孙子摄政的政权，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那些著名的共和派人士则在他们主办的报纸——较温和的《国民报》(*National*)和较激进的《改革报》(*Réforme*)的办公室里会面，与街头那些无名的、秘密而积极地从事武力行动的社会分子一起，敦促并寻求建立一个新的、共和体制的政府。

傍晚时分，在盛大的既混乱且狂喜的场面中，由著名的国会议员和共和派新闻记者组成的临时政府在维莱酒店(Hotel-de-Ville)宣告成立[31, 36, 71]。这样，一场革命就成形了，因为，在充满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形势中，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许多一贯支持它的人的信任。在应对民众不断增长的政治改革需求时，未能及时作出让步。当一个完全偶然的事件导致了大规模起义时，它则由于信任危机而陷于瘫痪中，无法进行协同有效的压制。因此，少数活跃的共和派人士就可以利用原政权突然失去

合法性这一时机，动员都城中的群众的支持，夺取政权，建立新政府。这个权力掌控的突然性正是未来革命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法国革命的消息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兴奋，激励着民众——主要包括城市中产阶级和熟练工匠——举行更多的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自由化改革。在奥地利帝国，迅速出现了危机。3月3日，科苏特（Kossuth）成功地说服匈牙利国会下议院的大多数人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原 Pressburg）召开会议，支持宪法改革方案，试图在奥地利帝国内实现匈牙利自治。在同一天，31名下奥地利州各区的议员在维也纳开会，呼吁选举一个爱国的、开明的议会，向皇帝提供政治改革建议。然而，第二天，政治阅读俱乐部的一些成员——由多名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组成——发表的公告则更为明目张胆。公告谴责“独裁政府的压迫”，坚决要求撤换皇帝“现有的顾问团”，推行改革，认为要想恢复君主和他的人民之间的信心，必须实行改革。这需要建立一个联合议会，既有中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农民的代表；部长们应该对议会负责；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税收体系；成立信贷银行；进行司法改革；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以及废除检查制度。这预示着累积已久的愤怒躁动的爆发，在宫廷贵族圈中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然而，一开始，皇帝周围的顾问大臣们似乎已经决定抵制这些要求。首相梅特涅在同意有必要做出某些变化的同时，坚持认为这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而担任参议院议长的路德维希大公（Archduke Ludwig）则建议在维也纳加强卫戍部队，实施戒严令。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3月13日下奥地利州议会召开会议，广大民众借此进行大规模集会。随后，事态的发展与巴黎革命类似。军队奉命清除街道路障，遭到石块棍棒等物什投射攻击，于是最终开火；作为回应，示威者构筑了路障，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可以凭借它继续斗争。来自中产阶级的国民卫队拒绝服从命令，经过两天不断加剧的动乱后，皇帝被迫接受梅特涅这个旧秩序象征的辞职，并承诺制定一部自由宪法。梅特涅被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科洛拉特取代，后者自1825年以来一直担任内政部长。15日，他还接待了匈牙利国会代表团，向其作出让步，承认匈牙利人在处理自己的事务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权 [89, 143]。

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事态迅速发展。政府垮台了，在这种形势下，被统治的下层民众必然希望能够从中获取好处。3月11日，一伙人在布拉格的圣瓦茨拉夫浴室聚会，准备向奥地利国王递呈请愿书，这些人主要由捷克各行业人士组成，此外还有几个德国人。请愿书以恳

求、效忠的语调请求统治者采取自由改革措施 [141]。在意大利，事件的发展更为激进，各独立城邦的统治者被迫接受以 1830 年法国宪章为蓝本的宪法。在这里，所发生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与发生在法国和奥地利的事件无关。实际上，欧洲第一次暴动发生在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 (Sicily Palermo)，在当年的 1 月 12 日。随即蔓延到那不勒斯王国的主要地区，迫使斐迪南二世于 1 月 29 日批准了新宪法。其他各大公国纷纷效仿，托斯卡纳大公爵于 2 月 17 日，教皇于 21 日，皮埃蒙特的查尔斯·阿尔伯特 (Charles-Albert) 于 3 月 4 日均作出类似举措，以避免事态变得更糟糕。

3 月 18 日，很显然，受到巴黎和维也纳革命消息的鼓舞，在米兰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暴动。在那一天，大约一万人上街请愿，要求新闻自由、建立意大利国民的民兵武装组织，以及进行议会选举。再一次地，游行队伍与部队发生冲突，于是在市中心构筑路障。尽管维也纳方面曾提醒奥地利军队的指挥官拉德斯基注意防范，但他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经过五天极为艰苦的巷战，拉德斯基被迫将部队撤离，后退到科莫湖 (Lake Como) 和波河 (River Po) 之间的防御带，即所谓的四角防线 (Quadrilateral) 之中。在米兰，据不完全记录，起义中的死者包括 107 名工匠，41 名其他工人，35 名

店主、职员等，还有 12 名农民，26 名仆人，4 名学生，3 名学徒，16 名资产阶级（商人、地主等）和 4 名儿童。其中 39 名为女性。一如往常那样，工人构成了起义者中的大多数，但在意大利，对时局不满的农民也经常加入起义队伍当中。更令奥地利人丢脸的是，齐希将军很快就在威尼斯向起义者投降。维也纳政府没有给他明确的指示，这令他感到沮丧，实际上政府自身问题多多，应接不暇。他的军队中有很多意大利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不可靠。因此，他的处境看起来很艰难。紧随在他投降后，威尼斯共和国于 3 月 17 日重新成立，并建立临时政府，由丹尼尔·曼宁领导。随后奥地利驻军撤出了威尼斯的大部分地区，只有通往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的门户——维罗纳（Verona）仍然由奥军占领 [145, 150]。

在德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在四处蔓延，法国革命的消息也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政治诉求。据报道，德国西部在 2 月底发生了动乱，随即在 3 月的第一周扩展至巴伐利亚州和东普鲁士，再下一周就已蔓延到包括柏林在内的德国北部地区。与法国相比，德国的政治分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混乱的事件。然而，在 1847 年，尽管尚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政治团体，然而在新闻媒体、各邦国议会以及普鲁士联合议会中，已经出现了自

由和民主运动的领导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每一个德国邦国首府发生的革命事件均具有类似的过程。

同时，在德国西南部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了骚乱，蔓延到德国中部和东普鲁士。这些骚乱表明，农民要求废除遗留至今的封建义务、保护其使用公共土地和森林的传统权利，并惩戒“高利贷”——这一称谓经常出现于反犹用语之中。这些运动，显然受到了政府权力部门可能即将垮台这一看法的推动，使它的发生成为时间早晚的问题，但除此之外，它们和那些发生在城镇的、更具“政治色彩的”运动没有什么联系 [83, 92, 130]。

危机与日俱增，在这种形势下，较小的德意志邦国中的保守派不可避免地会寄希望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支持。但这基本指望不上。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需要面对众多要求改革的请愿书，面对严重的城市和农村骚乱，还要担心法兰西共和国对周围邻居的、尚未明朗的态度。尤为重要的是，在3月16日，传来了奥地利政权垮台的消息，他终于决定做出让步。然而，同意改革的消息于3月18日宣布已为时过晚，根本不足以平息混乱。正如巴黎的表现那样，相互矛盾的意见和决策中心的优柔寡断让政府走向垮台。

尽管如此，3月18日政府还是决定用武力阻止柏

林市内的游行群众进行进一步施压，军事行动导致超过200名平民伤亡，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工人 [100]。这一举措带来的主要后果就是激起了进一步的抗议，到了19日上午，尽管军队成功地清除了路障，政府还是放弃了镇压策略，命令军队撤离该城市。据宣布，国王已经同意建立君主立宪制。这个消息，再加上来自维也纳的消息，确保了其他德意志邦国也会做出类似的让步，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转而求助于赞成自由改革的政治家，希望他们能够控制革命带来的威胁，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89, 123]。

比利时与荷兰政府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通过扩大选举权，制定扶贫方案，来努力减少民众的不满。在英国，宪章派人士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来自巴黎的消息。在哈利法克斯 (Halifax) 的一个会议上，他们通过决议，声称法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值得所有处于王权专制统治下的民族，尤其是那些被暴君独裁者统治的民族来效仿” [164]。尽管作出了这样表述，而且尽管欧洲大陆的革命事件对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以纺织为主的城镇的贸易造成了严重影响，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大多数宪章运动领导人还是没有放弃他们完全合法的煽动行为。虽然在1848年短暂恢复了活力，宪章运动已经在走下坡路，局势的发展表明该运动已无法获得足够的支

持，对现有政权无法构成真正的威胁。只有在伦敦，在毛纺行业严重萧条的布拉德福德地区，还有利物浦，才有可能发生暴力，而且，在所有这些地区，发挥主要作用的都是要求废除联盟的爱尔兰移民。在伦敦，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作坊、众多闲暇的建筑工人和一般劳力，他们像巴黎街头的工人们那样游行示威，让伦敦的紧张局势与巴黎有几分相似。很显然，宪章运动的分裂状态及其领导人的犹豫不决让政府得以从中渔利。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官方明显的预防措施。军队和警察的部署以及特殊警员的配备，更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狂躁情绪。然而，官方又避免提前进行镇压，以免增加市民对宪章派的同情 [161]。宪章运动为了争取民众支持而夸大宣传，在要求改革的国民请愿书中作大量虚假签名，新闻舆论也将每一个哪怕极小的骚乱归结为宪章运动所致，并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姿态宣传该运动与爱尔兰独立诉求之间的联系。这些做法让宪章运动蒙上了不好的名声，并与民众之间产生了隔阂，到了6月，英国政府证实了这些情况之后，认为可以对多个地区和全国的宪章运动领导人实施抓捕 [158, 159, 162]。

然而，在这一系列发生革命演变的地域的两端，一端是在俄罗斯，政治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基础，并处于政权当局有效的镇压之下；一端是西班牙，倒是有可

能爆发革命，因为它的政府根基薄弱，民众普遍反对政府，又具有起义和军事政变的传统，而且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只有马德里和塞维利亚发生了小规模起义。这一次，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将军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团结 [160]。

因此，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欧洲各国的反应完全不同。像英国那样有可能修改宪法的国家，支持改革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不太可能得到群众支持，就算此类活动确实发生了，也不足以对当局构成如此重大的威胁，令当权者感到不得不用军事力量进行镇压。部署部队很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加剧，这种暴力冲突只有那些意志坚定、拥有足够信心能获得有产阶级的支持并能够指挥军事力量的政府才能制止。然而在1848年，政府的无能，有产阶级之间的分裂，政治精英们信心的丧失，以及政府垮台产生的多米诺效应，多种因素结合，助长了民众提出更多改革诉求，同时削弱了政府的抵抗意志 [71]。

第四章

论革命的局限性：革命后的冲突

在不同国家，最初的“革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法国，人们通过暴力推翻了君主制度，在伦巴第-威尼斯则是武力驱逐外国统治者，或者如匈牙利般采取立宪方式，而在德意志联盟各国、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则达成协议，寻求在宪法上做出妥协。更加复杂的是，那些刚刚夺取政权或者正在寻求与前政权和解的团体，实际上是多个派系的联合体。无论是在政治中心还是在其他众多地方，它们都由目标各异甚至相互冲突的人士组成。旧政权的崩溃是如此突然。那些声称要分享政治权力的人感到非常惊讶和措手不及。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他们始终没有时间来冷静地审时度势。当然这样的意外也有一定的好处。这样，在爆发政治危机的首都以外的地区，保守派，包括军队在内，就只好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虽然被革命事件，尤其是被社会将会改革的预期吓得不轻，他们往往会勉强接受政府层面的种种变化，而不会做出其他任何明显的取舍。尽管中央和地方权力普遍被对前政权持批评态度的自由派人士接收，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出面对此表示反对。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越来越明显地可以看出，保守派精英们只是在等待时机。

革命之后旋即产生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确定新政府的成员构成，建立它的权威，并确定宪法落实事宜。如何巩固革命成果？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受此鼓舞，先前寂然无声的团体又会提出什么样的政治诉求？在这些争权夺利的不同群体中，哪些能最终保持权力呢？革命是否将再一次引起跨国战争？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革命初步成功后，紧张局势并未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25, 26]。

在法国，在民众拥护下成立的临时政府，在社会地位、个性和政治立场方面已经出现了分歧。临时政府 11 人中有 7 人是富有的知名人士，并曾在七月王朝担任议员——杜邦 (Dupont)、阿拉戈 (Arago)、拉马丁 (Lamartine)、玛丽 (Marie)、克雷米约 (Crémieux)、勒德律·洛兰和加尼耶·帕热斯 (Garnier-Pagès)；而玛丽、克雷米约、阿拉戈、加尼耶·帕热斯和马拉斯特 (Marrast) 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缺乏从政经验。这些人一致反对七月王朝，因为他们曾参与选举权改革，并含糊地支持尚未明确的社会改革措施。他们同情穷人的境遇，但是，像其他地方的贵族和中产阶级改革者一样，他们不愿或不会考虑可能会显著改变现有社会体系的变革。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角色主要是维持社会秩序和行政治理的连续性，并极力将他们行动降至最低限

度，直至选举产生制宪议会。尽管如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这些谨慎从事的人也觉得有必要同意成年男性选举权，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以及国民警卫队平民化等基本权利。这些让步使选民人数从25万增加到近800万，并可能促进民众政治参与热情，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后果。只有少数人提倡更积极的社会改革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勒德律·洛兰，社会主义理论家路易·布朗和工人阿尔伯特。因此，2月25日颁布的法令，虽然承认民众拥有工作权，并建立了国家工场，该法令只是打算提供一个改革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向失业人士提供传统形式的工作救助。然而，许多工人相信，这只是按照布朗在《劳工组织》(*Organisation of Labour*)一书中所建议的生产合作社的第一步。这一举措，再加上其他的措施，如每天的工作时间减少一小时，废除劳务分包体系，也就是劳务代理制度，同时成立卢森堡委员会，由布朗担任主席，深入调研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提出改革建议等，让工人们产生了一种期待感，如果不能实现这种期待，将会陷于危险境地。很快，大家清楚地发现，达成一致反对君主制容易，一致同意推行积极的改革措施却很难 [40, 55]。

类似的情况在奥地利和德意志联盟各国普遍存在。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感到必须同意制定一

部宪法，并考虑改革选举制度。为了实施这些举措，他任命莱茵兰地区的两位主要的自由派人物，坎普豪森和汉泽曼为内阁部长。关于另一个关键议题——大德意志统一——国王更关注于维护他自己和王子们的权利，不愿冒险采取主动策略^[95]。然而，此事并不能拖延。3月5日，51名来自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自由派人士进行了一场纯正意义上的革命行动，他们在海德堡召开会议，选举了由7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召集各邦国现有的议会代表在法兰克福召开大会。3月30日，经其中的600人同意，成立了一个预备议会，并通过决议进行全国性的选举，选出代表组成国民大会，由该大会负责起草一部德国宪法，同时还规定国民大会按每5万名居民有一名代表来产生——虽然每个邦国都允许建立自己的选举体系——选民的基本资格是“独立”，也就是说，享有财产所有权。后一规定表明，与会代表不愿意冒险与统治当局决裂，也表明对仍掌控于统治当局手中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的继续依赖。除了一小撮激进分子外，宪法改革的支持者希望通过妥协方式，通过与合法设立的权力机构达成“共同约定”来推进改革。这种不愿意激起更多暴力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也给君主和传统精英们留下了足够的操纵空间，虽然有必要在短期内做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因为革命引起了民众广泛的政治参

与热情 [106]。

这在每一个受革命影响的国家中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即各个不同群体都觉得可以提出要求并使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承认。在许多社区，在当地政治派别的怂恿下，这一情形更为明显，名门望族的成员想利用不稳定的政治局势，谋取行政公职，以此作为提高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一种手段。代表各种政治立场的俱乐部、讨论小组以及报纸的创立，就是这种争夺地方和国家权力行动的最明显的表现。这种现象在大城市持续时间最长，但在大部分地区都曾出现，它同时通过直接影响和效仿过程，鼓励工人和农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一些社区，现存的社区服务体系和互助会等组织宣扬团结意识、推动互助协作，在这些地方，大规模参与现象尤为显著。在巴黎，在其鼎盛时期，各政治俱乐部大约有 10 万名成员，工人协会近 4 万个。这只是将散布在咖啡馆和街道的骚乱活动变成组织有序的机构行为。仍有四处散布的混乱发生，尽管是零星的。工人对失业和低工资提出抗议 [32, 42, 47]。农民抱怨税收、对他们使用公共土地和森林的限制，以及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其他各种现象。在阿尔萨斯和德国西南部，当地农民谴责犹太人的“高利贷”，而在德国的其他地区和奥地利，则抨击残余的种种封建限制。“自由”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各种深奥难懂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原则，被各团体根据各自眼前利益作了重新解释，而且他们的表达方式常常显示出他们内心深处的、在通常情况下深藏不露的对社会秩序的反感情绪。因此，紧跟着革命之后，会出现比在真正的革命事件本身发生期间更广泛的混乱，尽管这些抗议运动，由于缺乏正式的组织 and 方案，通常会自行停止。其结果就是，新上台的自由主义政府部门经常被迫采用现有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

这一切都让民众心中的不确定感日益加重，给商业信心和活动水平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革命引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而那些接管了政府权力，或者，就像在大多数德国各邦那样至少获准分享一定权力的自由主义者，就因此而面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他们被寄予厚望，盼其采取措施减轻危机造成的社会困难，并防止混乱进一步加剧。同时，他们还参与了宪法改革的复杂辩论，在辩论中，至少在一开始阶段，他们都急切地想调和激进派和保守派，并减少出现进一步的革命或反革命的可能性 [55, 123]。

在法国，临时政府承认有必要采取一些权宜措施如成立国家工场，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救济，除此外，主要关心如何提振商业信心，将此作为恢复社会繁荣的重要手段。这需要保持良好公共秩序，避免采取“社会主义”

措施。为了实现前一个目标，再加上对国外势力可能干预革命的担心，让共和政体只能依赖于军队，这就确保了不会对军官团做出根本性的肃清运动。多达5万人的军队迅速部署到许多农村地区，镇压因农地和森林集体使用权的长期争端引起的动乱（特别是在东部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山地地区）。3月16日，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将直接税（主要针对土地）上调到高得离谱的45%，农民原本期望新政府能同情对待，结果却是更糟糕，这让他们彻底从幻想中觉醒过来 [37]。这反映了政府对平衡预算，并满足国家工场费用的考虑。作为增强商业信心的手段，这样的措施可以让人理解，但它却无法赢得农民对共和政体的支持 [40, 47]！在整个德意志联邦，各邦政府和自治市政府也试图通过增加工作救助计划，尽量减少不安定因素。与法国相反，德国提出了一系列能够减少农民不满情绪的建议，尽管就这个问题和其他事宜的立法被推迟到联盟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才能解决。这样，残存的封建领主权利将被削弱或取消，赋予农民对他们耕种的土地更大的控制权，虽然无地农民提出分割公共用地的要求被忽略不提 [102]。在奥地利也是如此，一系列措施（1848年9月7日颁布的通用法让这一系列措施达到了顶峰）作出承诺，废除农民的封建义务，有效地遣散了（聚众闹事的）农民 [83, 92]。

1848年开始的几个月伴随着从未有过的激烈的政治辩论，它扩大了自由派内部，以及自由派与支持政治民主和社会改革的人士之间的分歧。事实已经很明显，尽管大家普遍支持改革，对改革的本质却没有共同的认识。例如，在东普鲁士，拥有3900名读者的著名的《柯尼斯堡报》希望成立这样的议会政府，能让有才华者与中产阶级成功人士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但坚决反对将选举权扩大至未受过教育和政治上不成熟的普通民众。它也反对本国政府有任何义务向公众提供援助，并坚持认为在未来统一的德国内，必须保持普鲁士的自治权^[114]。这些观点是那些反对社会改革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体现，也代表了越来越感到担心的中产阶级的内心想法，他们看到劳动阶级日益变得“蛮横无理”，并对那些坎普豪森称之为共产帮的人图谋进一步革命的前景感到恐惧^[119]。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同意使用军队镇压每一个——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私有财产神圣性的威胁。1848年夏天成立的由民主派主导的《新柯尼斯堡报》，对这些观点提出异议，但它的订阅量不超过500份。

局势越来越紧张，在柏林尤为明显，涌现了大量的新报纸、小册子、协会和政治俱乐部，试图对国民施加影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左翼报纸是共和派和社会民

主派的报纸《报馆》(Zeitungshalle), 还有更为激进的《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 它要求将大种植园划分给穷人, 并号召发动阶级战争。印刷工人斯蒂凡·波恩(Stefan Born),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亲密伙伴, 在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人中央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认为, 虽然工人有必要迫切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其工作权利、给生产合作社提供政府信贷并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在目前情况下, 他们仍需依赖于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共同反对贵族和君主制度, 应注意不要吓坏中产阶级。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 骚乱日渐增多, 而拒绝加入新的国民警卫队等措施更是加剧了这种骚乱 [76, 88, 112]。

5月18日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召开会议起草宪法的代表们之间也存在这些分歧。限制性选举权(约10%~25%的成年男性被排除在外)、非直接选举制度、民众对政治的冷漠, 再加上中产阶级在教育 and 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 诸多因素导致(如法国一样)选举产生了一个由法律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占据主导的议会 [90, 121]。(在其人数最多的时候包括1个农民, 4个工匠, 11名神职人员, 60个地主, 80个商人, 106名教授, 223名律师, 118名高级官员和116名无职业人士)。即便如此, 联邦议会和国家议会的同步选举无疑有助于推动政

治化进程。在法兰克福议会内部，很快就形成了多个派系。由黑森州贵族海因里希·冯·盖奇（Heinrich von Gagern）担任领袖的所谓的赌场党（根据该党的开会地点命名），也就是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是议会中最强大的派系。比它的主张更右的是排他主义者和反动保守派，他们在米拉尼咖啡馆聚会。中间偏左的自由派人士则在符腾堡酒店（Württembergischer Hof）和奥格斯堡酒店（Augsburger Hof）碰头。他们主要由南部地区对普鲁士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的人士组成，赞同人民主权观念。在唐纳斯堡（Donnersberg）安身的47位共和党人，以及人数不多、在德国人酒店（Deutscher Hof）集会，由罗伯特·布隆（Robert Blum）领导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派是最左翼的派系 [105, 124]。

大会成员们决心公开主张他们认为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他们很快建立了一个由摄政王领导并对大会负责的内阁，并切合实际情况，选择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一个奥地利和普鲁士君主都能接受的人，来担任摄政王。此外，他们投票通过决议，组建一支国家军队和舰队。然而，在是否要将奥地利和它的非德意志民族纳入新的德意志帝国 [131, 132]，关于选举权，关于社会改革的可能性等问题上，他们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性分歧已非常明显。宗教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同强化了这种政治分歧。但

是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对民主的普遍反感，也可能是由于无法达成别的替代方案，1849年4月12日，最终还是出台了一部宪法，做出了非常接近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规定。此时，大会行将解散 [84, 90]。更具特色的是大会的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它考察了大量的事实证据，而后提出了多项建议措施，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减少行业协会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在一份充满自得语气的声明中，它拒绝做出法国临时政府承诺的工作权保证，其理由是：“这样的保证会使勤奋的人变得懈怠，为懒惰行为找到借口。”相反，它认为它的职责是“加强劳动阶级对其力量的信任，上帝赐予他们劳动的能力作为生活之必需” [79, 99]。

事实很快就非常明显了，这些措施中任何一条的实施，都取决于主要邦国的良好意愿，大会尤其依赖于他们的军事支持。这一点在1848年9月表现得很清楚，当时共和派人士在法兰克福发起暴动，抗议对丹麦省份石勒苏益格 (Schleswig) 和荷尔斯泰因 (Holstein) 兼并行动的失败，一批流亡者越过边界进入巴登，试图宣布成立巴登共和国。1849年4月，大会终于就宪法提案达成协议，该提案包括建立一个拥有民选议会的联邦制国家，一个对议会负责的部长内阁以及具有重大实质性行政权力的皇帝。但是在当时最被看好的候选人弗里德里

希·威廉，却坚决不接受民选议会呈上的帝国皇冠。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代表由于意识到他们的地位的脆弱而且急于避免出现混乱局面，不愿意尝试推行强制性解决方案 [90]。大会已经丧失了所有的信誉。继奥地利和普鲁士召回代表后，大会于5月30日解散。自由资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失败，以及它对保持秩序的关注尤甚于它的政治权利的做法，给史学家展现了一个“德国历史的特殊之处” [81, 94]，虽然，在1848年革命的背景下，对“自由”的矛盾态度绝非其独有。

法兰克福大会的历史本身表明，史学家并没有从德国各盟邦的层面给予政治事态发展足够的重视。然而它们中大多数存在着相似的发展模式，这是显而易见的 [85]。当时盟邦中在政治上最重要、人口最众多的普鲁士，在1848年4月2日，它的坎普豪森-汉泽曼内阁政府勉强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一项提案，赋予所有超过24岁的男子选举权（非直接选举，以此作为限制它的民主影响的一种手段），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将与国王一起讨论宪法问题。议会虽然仍由旧有的精英把持，但服从于改革要求 [按俾斯麦 (Bismarck) 的说法，是“被恐吓”]，它也同意了国王已经作出的种种让步，诸如新闻和集会自由，平等对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以及由议会控制国家预算等。5月初经选举产生的新议会与法兰克

福大会在成员的社会构成上具有显著的不同。它包括178名官员和律师（但总体上级别并不太高），49名农民（只有24人是大地主），28名工匠，50名神职人员和27名教师。在政治形态上也是自由派居于主导地位，但在其中有了一个更大、更活跃的激进派团伙。6月下旬汉泽曼取代坎普豪森成为内阁首脑，他决心重塑普鲁士邦的政治生态以削弱贵族的权力，并提出终止贵族的免税特权，缩减他们在地方上的行政和司法权力。然而在10月召开的议会行动过火，竟然投票通过决议，取消诸如“上帝恩眷之国王”这样的用词和贵族头衔等普鲁士社会的基本符号。这些举措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国王支持下的强烈反抗，他通过干预政务，尤其是军事事务，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立宪君主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由于他们担心发生民众骚乱，自由派人士的信心日益丧失，而王室宫廷贵族则重新焕发了信心，他们看到，内阁部长的任命日趋保守化，而且在12月，曼托伊菲尔（Manteuffel）内阁未经议会同意强行颁布了一部宪法。该宪法既保留了男性普选权和内阁对议会负责制，又坚持认为国王具有立法否决权，并可以通过颁布命令进行统治管理 [95, 96]。

1848年3月，面对发生在城市街道上的流血冲突带来的压力，奥地利政府对自由派人士作出了让步。这

些让步包括承诺改革警察和中央行政管理，并建立议会制政府。4月25日，宣布设立上下两院制议会，下院议会由选举产生，议员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限制，而上院议会则由大地主和由皇帝任命的成员组成。此外，君主有权否决所有立法规章。这激怒了民众，5月15日，人们在维也纳再度示威游行，统治阶级不得不再次让步，同意24岁以上、“独立工作”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并成立一个单一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个帝国议会将在7月2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383名议员中，资产阶级将占60%，农民占25%，其余主要是僧侣和贵族；190名斯拉夫族代表当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缺乏从政经历，而利益上的巨大分歧也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这使他们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决议。

虽然对发生在城市中的抗议浪潮作出这样重大的让步，内阁首脑人物仍处于不断更迭中——主要包括高级文职人员，如科洛拉特、费科蒙特（Fiquelmont）和皮勒斯多夫（Pillersdorf）——而且他们似乎更害怕农村暴动，1846年发生在加利西亚的起义暴行让他们记忆犹新。因此，3月28日政府颁布法令，废除劳役（奴隶）和其他封建义务。后来由议会对此作出确认，这足以安抚绝大多数农民。之后在奥地利本土内部（不包括匈牙利和意大利），皇帝及其顾问大臣们面对的根本问题就

是控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运动。在维也纳，具体表现就是扩大了武装的国民卫队，以及建立学生军团，形势愈发危险。当局还试图阻止民众示威的进一步发展。如5月15日的民众示威后，王室曾秘密离开首都，前往更为安全的茵斯布鲁克，此举表明，“共和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给王室造成了不小威胁。

在茵斯布鲁克，以及其他说德语的省份，如林茨和格拉茨，公民委员会已经控制了当地政府。但也可以假定，这些机构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会进行合作，防止再次出现攻击食品商店、焚烧税务登记机关等事件，而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前一阶段的革命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一旦对自由主义诉求作出了让步，就已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重组。那些较温和，尤其是那些较富裕和经济上有保障的上、中层人士、中产阶层（地主，官员，商业和各行业人士们）重申了他们的基本愿望，希望避免社会发生根本变化，他们愿意保留一个强大的、能够保护其利益的君主制政体 [89, 143]。这实际上是整个欧洲对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要求的发展演变过程出现的普遍反应。

这种要求明显因通常面临的镇压趋于缓和而开始出现。现在，激进动员措施最为有效，在这样的动员中，资产阶级专业人士擅长于沟通与政治组织，与工匠群体

联合，在有些地区则与农民联合，这些农民通过他们的行业协会和社区团体等形式而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基本的组织结构，并且都有捍卫他们的生计、抵抗越来越大的商业压力^[4]的愿望。通过这些关联，民众心中现有的不满就可能逐渐地与明确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虽然不太可能使多数工人和农民从制度和思想的深层形态上觉醒并形成现代政治的概念，新的自由权利和期待感还是让大家尤其是城里的民众开始进行讨论、组织并宣传，这大大加快了政治化的进程^[72]。最先是在法国，这种激进的政治的成长导致爆发了新的革命，并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反应。

巴黎仍是法国革命的前途的关键所在，在那儿，工人合作社与广泛存在的俱乐部让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政治社团再度复活。诸如奥古斯特·布朗基 (Auguste Blanqui) 的社会共和中心 (Société républicaine centrale)，或巴贝斯 (Barbès) 的革命俱乐部 (Club de la révolution) 的言语经常非常激进，后者在宣言书中声称：“我们现在仍然只是徒有共和国之名，我们需要真实的东西。政治改革仅仅是社会改革的工具”。这些激进组织决定向临时政府施压。突如其来的自由感觉以及政治生活的觉醒就这样转变成了激进分子和工人们政府对政府的持续施压，他们避免使用请愿书，那会被看做对 1830

年革命的背叛。其主要示威活动出现在3月17日（约15万~20万人参与）、4月16日和5月15日。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些目标实现，3月20日，大约60名巴黎俱乐部的代表商定，联合建立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俱乐部，最终派遣300~500名组织者到地方各省去建立组织。在那些地方，也有无数的——多数存在时间都很短暂的——俱乐部（既有激进的，也有保守的）被组织起来，它们的日常活动也比以前更具有政治色彩。在里昂等城市，民主团体基于现有的秘密社团的结构组织而成。很显然，与1830年相比，到了1848年，工人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多了。通常，这些俱乐部既有中产阶级会员，也有劳动工人阶层的成员，但由中产阶级来领导。通过“劳工组织”和“民主共和社会”等宣传口号，它们让社会改革的要求为世人所熟知。这些做法，再加上其暴力表达方式，吓坏了保守人士，大大加剧了社会紧张感 [32, 55, 62]。

许多激进分子曾认为，制宪议会由全体男性选民普选产生能够确保致力于社会改革的人占大多数。然而，尽管持激进主张的候选人在政治意识相对较高的城市中下层和工人阶级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乡下，在绝大多数选民所生活的乡下，往往保守派的宣传组织更成功，而且它强调恢复社会秩序是重建社会繁荣的唯一方

式，这对农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面对如此众多的候选人，缺乏经验的选民往往求助于他们一贯倚赖的顾问人士，求助于那些因财富、教育或职务而享受某种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人，包括神职人员。事实上，建立合乎资格的男性普选权的制度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保守主义的投票和宗教信仰之间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协调关系，与这种关系相反就被认为是对宗教及社会秩序等永恒价值观的挑战。在佛兰德，以及在西部和西南部，社会宗教因素往往比阶级差异更具影响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影响力，通常就会采用恐吓方式。穷人需要谨慎行事。毫无疑问，一旦看清楚共和国无助于改变他们的处境，甚而试图提高税收，许多农村选民的热情很快就会消退。还有些人则仍然相信，共和政体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他们会投票给那些承诺保护他们免受损害的候选人，因为据称，共和党人计划重新分配土地，就是所谓的均产分子。民主共和党人几乎没有时间来反驳这种论调。

1848年4月的选举结果令人很难评估，因为当时尚未出现有组织的政党，而且许多候选人出现在一些明显不相容的政治派别的名单之中；实际上几乎所有候选人都声称自己是共和党人，并推出了极为含糊的政治纲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确定三个基本派别：保守派，

温和派和激进派。前两者倾向于强调其对家庭、财产、宗教的尊重，以及恢复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温和派共和党人基本上对临时政府作出的政治革新表示满意。激进派则坚持认为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包括对工作权利的承认，以及为了确保这一承认而在经济上采取的国家干预措施。同时，其成员通常还须尽可能地让保守派人士相信，1848年革命绝不会出现1793年大革命的恐怖专政现象。

制宪大会的成员资格也很可能引发冲突——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尤其是与那些巴黎的团体之间的冲突，他们已经把这场革命视为开创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工人的权利（就业、体面的工资和自我尊重）能够受到社会的认可。在1848年前，近900名当选代表中，似乎只有少数代表（约300名）主张共和，而这些人当中，只有70~80人或多或少对采取重大措施进行社会改革明确表示同情理解。其余都是君主主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临时给自己贴上了共和主义标签（可能包括5名波拿巴主义者，56名世袭王位主义者，19名前总理基佐的支持者，231名前王朝反对派的代表，还有133名不知忠于哪一王朝的君主主义者，以及122名未表示明确意见的人士，但无疑基本上也是君主主义者）。从社会角度来看，这将是一个由富有的各省名人

组成的议会。这些人包括地主以及尤为众多的传统资产阶级行业的代表：261名自由行业人士，包括176名律师；约170名政府官员；170名经济界人士，其中24名来自工薪阶层；279名所属行业未知，但主要是大地主（propriétaires）。大多数成员没有什么政治经验，这使得那些经验丰富的国会议员们应对起来相对轻松，而这些人主要是来自7月王朝中的左派和中左的自由派人士，他们通过娴熟的政治辞令，协调会的组织（通过普瓦蒂埃街委员会），充当着领导角色并控制着议会各委员会。事实上，在6月举行增补选举中，国会代表们见证了莫尔以及最著名的梯也尔等奥尔良派领导人的回归 [31, 33]。

很显然，巴黎的激进主义者对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失望，5月15日，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波兰人民反抗俄罗斯统治，随后冲破国民卫队在制宪议会周围设置的警戒线，进入大楼，要求法国出兵干预东欧事件，并立即采取措施，为工人提供就业和食品。某些军事激进分子，尤其是胡贝尔（Huber）和索布里埃（Sobrier），试图建立拥有无限权力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并宣称其目标就是对富人征收额外税，用以资助设立生产者合作社。这一企图未遂并很快就被镇压。它似乎并未做周密计划，而且群众也都手无寸铁。随即，不仅主要参与者被

捕，而且其他激进分子也被牵连，包括布朗基、拉斯贝（Raspail）、巴贝斯以及前部长阿尔伯特等，一些政治俱乐部也被关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也被终止，该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也从未被讨论过。5月15日，致力于恢复“正常状态”的保守联盟势力进一步加强，加速了巴黎政治派别的两极分化^[55]。虽然由制宪会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重申了其改革承诺，比如税制改革，提供低廉的信贷，以及将铁路和保险公司国有化等举措，但其主要关注之处仍在于公共秩序的维持。这一目标迫使它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议会中有着良好组织的保守派团体。于是他们的注意力逐渐投向国家工场，它既是革命的象征，又是一个昂贵的、日益政治化的并具有潜在威胁的工人组织^[33, 36]。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大批的人拥在街道上，聆听极端共和主义者还有波拿巴主义者的鼓吹，直到警察将他们驱散。虽然看起来国家工场是临时政府为了兑现其保障工人工作权的承诺而实施的项目，其效果颇令人失望。他们付出了艰苦但往往又毫无意义的体力劳动，却只能获得极其微薄的薪酬。原先设想国家工场作为遍布全国的工人合作社网络的第一家，可以根据工人自身所擅长的行业予以聘用，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它们无非就是一个传统的慈善工场而已。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

社会主义者们一直在讨论合作社，只要国家工场存在，这个社会改革的梦想就会继续存在。

然而，国家工场的存在日益受到制宪议会的质疑。正如警方汇报显示，工人们最终对依法进行的政治改革进程越来越失望。最后，在6月22日，国家工场被宣布关闭。年龄介于17至25岁之间的工人被给予进入军队服役的机会，对于其他人则承诺在地方各省的公共工程中予以安排就业。由一个名叫普霍尔（Pujol）的人领导的工人团体被代表执行委员会的玛丽告知：“如果工人们不愿离开，我们将强制将他们逐出巴黎”，语气强硬干脆，毫无掩饰。没有任何措施出台来安顿这些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尽管贫困救济条款规定必须有所安排。这些话被报道转载，传到了聚集在卢森堡宫前的人群中，接着又传到了巴士底狱，这让很多人相信，面对这样一个冷漠的政府，别无选择，唯有发起革命。他们曾经认为，共和国将会保障他们的就业，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然而现在他们最后的希望也被剥夺了。他们感到，自己被这个他们在2月份努力创建的政权背叛了。23日，继在先贤祠和巴士底狱爆发的更进一步的大规模集会之后，又一次是在普霍尔的演说及其口号“不自由，毋宁死！”的鼓动下，一场本质上自发形成的起义开始了，整个巴黎城被起义明显分割成了两部分，而路障主要构筑在较

贫困的东部区域。领导权逐渐从广为人知的俱乐部激进分子转移到起义所在区域领导人手中。起义者从枪炮技工和私人住宅中夺取了各种武器，许多人已经具有了和国民卫队一样的装备。事实上，在大部分地区，斗争的基本组织架构已经仅次于国民卫队军事组织了。然而，起义行动没有总体计划，没有形成共同领导，很快起义就沦为分割在众多社区中令人绝望的孤军奋战了。

从众多被捕的人中获得的信息表明，起义者主要来自城市中小规模的手工作坊行业，如建筑业、金属加工业、服装和鞋类以及家具行业；此外，有些工人来自从现代工业企业，例如铁路工程制造厂，还有许多没什么技术特长的劳工，以及为数并不太多的小本经营商人。他们并非如保守派人士一贯宣传的那样，是一些无家无业的流浪汉，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并很好地融入他们的同业公会和邻里社区之中。正是这些忠诚的革命力量的参与使得巴黎城内第六、第九和第十二区发生的战斗尤为激烈。每个主要城区中心的抵抗都由特定行业公会来主导——在拉维莱特 (La Villette)，是运货马车夫，在圣·马丁运河沿线，是码头工人，在巴黎寺院街 (Boulevard du Temple)，是青铜器工匠，而细木工匠和装饰陈列柜制作者则是圣安东尼北郊 (Faubourg St-Antoine) 的抵抗主力。

各方对参与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可能有4万~5万人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其中。许多工人失业在家，其他人则一直在国家工场争取薪酬，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人离开国家工场投身到街头路障的战斗之中。有些人站在另一立场上战斗。但还是有相当多的男性和一些妇女对革命的结果表示非常失望，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革新的共和国。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为公平正义而战 [55, 63]。

代表社会“秩序”的力量也在各区域组织阵势抗击起义者。这些力量就是来自较富裕的西部城区的国民卫队，主要由业主、店主、神职人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和工人构成。他们急切地想要保卫他们自己的社区，致力于维护一个有序的、分等级的社会，粉碎他们视为威胁的社会革命，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必将导致革命。政治分歧被抛之于脑后。尽管有许多工人并没有向国民卫队报到，但他们约占了对抗起义者的国民卫队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像来自科勒兹 (Creuse) 地区的石匠马丁·纳道德 (Martin Nadaud) 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起义视为对共和国的一种威胁。马丁描述了许多共和党人面临的痛苦抉择，他写道：

我们极度忧伤，内心犹如撕裂般的折磨，这种

1848年6月起义参与者：被捕人士所属行业统计

所从事行业	被捕人数	占总被捕人数的比例(%)
建筑业	1725	14.82
食品饮料业	438	3.76
家具业	1004	8.62
服装鞋类	1225	10.52
纺织业	351	3.01
皮革业	157	1.35
马车制造, 马具和军事装置	223	1.92
化学、陶瓷业	116	1.00
金属、工程和金属制品	1312	11.27
贵金属、珠宝业	231	1.98
箍桶匠, 篮筐编织工	68	0.58
印刷工人	433	3.72
苦力、挖掘工	1093	9.39
养殖、花匠、畜牧	141	1.21
搬运工	522	4.48
门卫, 仆人, 厨师, 侍者	282	2.42
物业主, 房东	47	0.40
神职人员	438	3.76
自由行业	208	1.79
艺术行业	72	0.62
商业(包括店主)	450	3.77
学生	39	0.33
卫队机动人员	163	1.40
警察和士兵	216	1.86
捡垃圾者, 小贩等	297	2.55
其他	297	2.56
未具体分类行业	94	0.81
	11642	99.90

来源: Roger Price,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Batsford, 1972), 第165页。

痛苦非常的残酷。从人民这一边来看，他们充满了可怕的痛苦而绝望的怨恨；这种积怨大部分都是合乎情理的。站在共和国的角度，我们也有基本原则，共和国的伟大原则，个人无论犯什么错误，政府尽管拥有最高权力，也不应对其正当权利有任何侵犯。

这一立场让勒德律·洛兰这样的激进分子从巴黎工人之中孤立了出来。在战斗中，卫队机动人员被寄予了重要作用。这支队伍形成于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从年轻人、失业工人中选拔组织而成。直到最后一刻，仍有人怀疑他们的可靠性，但由于他们还年轻，尚未进入行业公会以及融入所在社区团体中，所以他们仍然忠于身边的同仁以及向他们支付薪酬的政府部门^[65]。然而，在镇压行动中，最重要的仍是正规军，在有产阶级眼中，这就是“文明的救世主”。全局性指挥则交由国防部长卡芬雅克(Cavaignac)负责，他被制宪议会于24日任命为政府首脑，以取代名声扫地的执行委员会。

卡芬雅克担心“二月革命”中政府军失败的先例再度上演，当时部队由于过于分散而被起义者击溃，于是决定集结他的军事力量。这需要很多时间，而且这一延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军事上显而易见的无所作为助长了起义者的信心。这使他们能够说服和强制不愿参加者

加入起义队伍中，进一步扩大路障设置区域。然而，完成军队集结之后，只经过三天的激烈巷战，起义就被扑灭，12 000 人被逮捕（其中许多人因匿名指认而被捕），巴黎左翼人士被消灭殆尽，十年内没有恢复元气。艺术家梅索尼埃（Meissonier），时任国民卫队队长，描述了内战中的暴力景象：“当蒙特里埃大街上的街垒被攻破时，我完全领略到了这场战争的恐怖。我看到抵抗者被击中倒地，栽到窗外，地上四处散落着尸体，鲜血染红了地面。” [37, 43, 49]

不管这场冲突准确的社会特征是什么，同时代的人把它视为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一次冲突，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这场起义是一次：

残酷、盲目而又强有力的尝试，工人企图借此摆脱他们贫穷的生存境况，而有人向他们宣传这是一种非法压迫……正是这种贪婪加上错误的认知，让暴动变得如此可怕……这些可怜的穷人被宣传误导，认定富人们的富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偷窃了本该属于他们的财富。

保守派媒体则将事件描述成是一个极端野蛮的事件，称暴动除了想要“抢劫和强奸”外，别无他求 [64]。

巴黎爆发起义的消息逐渐传到地方各省。各地出

现了一些表示同情与支持的示威游行，在马赛，6月22日、23日更是爆发了小规模起义。统治当局往往将这类事件看做一系列有预谋的行动，以巴黎为中心向全国扩散，企图破坏现有的社会体系。各地出现的压倒性反应却是动员民众捍卫当前的社会秩序。甚至在巴黎起义被镇压之前，来自各省的国民卫队志愿者还在长途行军，前往支援首都卫戍部队。在里昂，还出现了解除可疑的国民卫队武装的偶发事件^[48, 62]。最重要的是，“六月事件”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恐惧心态。人们刚开始为“秩序、家庭、人性、文明获得的胜利”（7月1日，《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而激动得哭泣，保守派人士以及许多昔日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就要求在政治上彻底转向（进行彻底清查与革命有关人员）。对于他们来说，起义是对制宪会议代表的人民主权论的肆意攻击。他们中的许多人准备联合其他重要人物，不论其持何种政治观点，抗击共同的危险。这些要人联合在一起，通过其掌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以及在行政、军队和新闻媒体中的地位，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影响^[66]。

巴黎革命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不仅在法国极大地刺激了极端保守政治的形成，在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潮流似乎正在转向。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都提出了这一观点，两人各对“六月事件”作出了深刻有力

的分析。他们的观点对此后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描述革命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6, 64]。

然而，这绝非标志着要求进一步革命的压力就此消失，这些事件使激进活动的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地方各省，在那里，从 1848 年秋开始，出现了“团结共和”这样由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的宣传组织。1849 年 5 月举行的选举结果表明，舆论出现了重大转变，尤其是出现了极为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持温和主张的共和派代表减少到了 75 ~ 80 个席位，而激进人士（山岳派或民主社会主义者）则上升到约 200 个席位，不仅各大城市工人阶级社区有了代表，在农村，尤其在东南部农村地区也有代表当选。左翼人士成功地将其政治纲领与经济萧条给农业和农村工业带来的紧迫影响联系在一起 [52, 55]，议会选举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农民向“红色阵营”的这种明显叛逃，以及这一动向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比超过 500 名保守派代表的当选更令大众舆论感到震动。大大小小集市中心仍散布着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他们作出了重大的努力，深入到各自所在的农村腹地，发展组织，并以歌曲、小册子和报纸等形式散播其政治主张。他们承诺保障人们的工作权利，免费教育，支持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提供低廉信贷，减少穷人税赋，提高富人纳税额度，以及将关键

经济部门国有化等主张。尤其是在那些具有较多相对独立的自耕农的地区，他们生活在大村庄里，与邻近的集市（和政治）中心具有良好的交通相连，对于这些人面临的迫切问题，左翼人士提出了似乎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让他们赢得了众多的支持 [30, 34, 51]。

左翼人士在地方各省取得的优势让倾向于军事镇压的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大增，在“六月起义”之后已经非常明显 [54]。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 1848 年 12 月当选共和国总统之后，这一状况更加突出 [167]。为了生存，民主社会主义团体逐渐被迫转入地下，实际上变成了秘密社团，经常借助于一些传统民俗活动方式，如狂欢节，还有沙里瓦里（一种传统抗议形式，由社区成员向某个触犯行为规范的人发起——使用下流猥琐的歌谣，并通过敲打汤锅、水壶等制造出刺耳荒诞的音乐），以此公开表达他们对当地保守人士的敌意 [35]。最终，在 1851 年 12 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浪潮，因为波拿巴发动政变的消息传来，这可能从根本上威胁到社会改革前景，而左翼人士仍然相信他们在 1852 年的普选中会获胜，从而有望继续推动社会改革进程。在中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抗议活动尤为强烈。尽管经济困难是造成动荡的主要原因，但它并不具备因此而卷入起义之中的决定性意义。然而，对于众多贫困人口来说，1852

年普选和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是他们摆脱贫困、不安和苦难的唯一手段，也是实现他们的主张，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的唯一途径。尽管他们的想法比较天真，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对时代进步、民主胜利抱着忠诚信念的共和人士所承诺的人类幸福的新纪元，值得大家去努力争取。

大约来自 900 个乡镇的近 10 万人被卷入其中，至少来自 775 个乡镇的多达 7 万人在这些起义中真正拿起了武器，超过 2.7 万人参与了暴力行为。武装暴动发生在中部 [阿列省 (Allier)、涅夫勒省 (Nièvre)]、西南部 [洛特加龙省 (Lot-et-Garonne)、热尔 (Gers)]，在东南部尤为集中 [德龙省 (Drôme)、阿尔代什省 (Ardèche)、贝司 - 阿尔卑斯 (Basses-Alpes)、埃罗省 (Hérault)、瓦尔 (Var)]，在比亚里茨 - 皮蒂维耶 (Biarritz-Pithiviers)、卢瓦雷 - 斯特拉斯堡 (Loiret-Strasbourg) 沿线以南，只有少量可耕作区域，这些地区以小规模的农事为主，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这些地区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事活动，如葡萄种植和丝绸，林业和农村工业在总体上一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顽疾，让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在这条线的北部和西部，在法国西部、北部、东北部和巴黎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并没有出现什么混乱。这些省份要么处于主要的、更大规

模的商业性农业地区，在这些地区，更先进的工业发展成果的运用或多或少减轻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要么在教会支持下，传统的上层人士仍保留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众多起义，由于自身的地域化和互相之间缺乏配合协调，很轻易地就被镇压了下去。他们在作孤注一掷的赌博，尽管这样，从工匠和农民的立场来看，他们还是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去捍卫民主，把它视为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方式——尽管所使用的手段让人联想到传统的农民抗议方式。对于保守派来说，这些骚乱给他们提供了进一步加强行政管制的理由，这种管制最终让1848年“二月革命”以来出现的这场漫长的政治危机走向结束 [52, 54, 55, 74]。

在德国，就像在法国一样，激进分子往往根据他们是侧重于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以及根据其在不同邦州的政治和社会立场来划分。他们常常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民主派未能赢得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的足够支持。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吓唬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自由派 [119]。不过，在1848年秋季、冬季以及1849年春季，他们仍能够对政治上的倒退行为，以及那些他们认为背叛了法兰克福议会确定的联邦事业的政策提出一些反对意见。6月，一小部分法兰克福代表组织召开了民主代表大会，10月在柏林也举行了同

样的会议。然而10月16日发生了工人们抗议削减公共就业方案的骚乱，让柏林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骚乱中有11人死于以中产阶级人士为主的国民卫队枪下。然后在10月31日，军队驱散了要求普鲁士议会通过决议支持维也纳革命的集会人群。这个柏林会议的主要进步成果就是决定成立一个常设组织，即“中央三月联盟”（Central March Association, Zentralmärzverein），由尤利乌斯·福禄培尔（Julius Fröbel）主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有950个地方组织，约50万会员追随其左右，这其中主要是熟练工人，他们同时也是中下阶层人士和从事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为了弥合在社会政策和政治策略的内部分歧，福禄培尔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努力说服联邦各地方政府接受法兰克福议会提出的宪制方案。这不可避免地让这一举措具有了平民大众化的、反君主专制的特征 [18, 78, 89, 113]。

作为一种激进的动员手段，更左一些的传统协会显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848年4月至6月期间，工匠雇主们举行了区域代表大会，准备向法兰克福议会提交方案。这些提案请求回到旧有的生产合作形式，限制大工厂的发展以及加强关税保护。他们也希望推行累进所得税制、低廉信贷、免费教育、保证工作权利，以及救济那些无法工作的人群。要解决小作坊主们所面

对的这些问题，最可行的办法似乎就是来自上头的支持，也就是要向法兰克福议会发起请愿运动所需的政府帮助。雇主们和雇佣工人之间在利益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让形势趋于复杂。后者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罢工行动，建立他们自己的协会组织，并在7月20日至9月20日期间独自召开了全德意志劳工代表大会，准备独立向议会提交一个方案。该方案包括一个最低工资标准，缩短工作日时间以及提供更多的让雇工成为雇主的机会。从9月开始，斯蒂凡·波恩通过总部设在莱比锡的工人兄弟会组织及其报纸《兄弟》(*Die Verbrüderung*)，作了很多宣传组织工作，呼吁手工作坊和工厂的技术工人联合起来。到1849年4月，工人兄弟会在近87个城镇建立了分支机构，拥有多达18000名成员。他们将教育鼓动与互助合作活动结合在一起。在坚持他们各方面的要求的同时，工人也清楚地表明了对非技术劳工给他们带来的就业竞争压力以及被无产阶级化的日益担忧。他们往往认同中产阶级的一贯做法，认为非技术工人群体不过是“乌合之众”，应予以遣散 [76, 89, 112, 118]。

1848年至1849年冬天，各地出现了众多民主俱乐部和工人协会，大多昙花一现，另外还出现了内容激进的报刊。这些事实表明，对左翼人士的支持普遍地趋于政治化，而且广泛动员民众予以支持。1848年3月，统

治当局的垮台给民众表达不满提供了新的重大机会，并激起了更多的人对政治活动的兴趣，尤其是那些有技术、有文化的工人，他们感受到机械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极大威胁，并深受合作生产的传统熏陶启发。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如新闻记者弗里德里希·赫尔德 (Friedrich Held)，或那个柏林的学生古斯塔夫·施勒费尔 (Gustave Schlöffel)，在《人民之友报》 (*Die Volksfreund*) [以马拉 (Marat) 于 1792 年创立的《人民之友报》 (*Ami du Peuple*) 命名] 等报纸上呼吁民众支持其政治主张。不过，他们本质上民主的政治纲领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卡尔·马克思，科隆《新莱茵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的主编，同样没能将政治改革与经济和社会改革联系起来，以使政治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联系更密切。与此相反，在同一个城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高夏克 (Gottschalk)，他呼吁削减食品税，并对手工业者和工人提供直接的财政补助，因此直到被逮捕入狱，高夏克一直拥有更多的民众支持。民主派和激进派在手段和目的上都存在分歧，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与沟通，从而制定出一个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左翼人士仍保持着地理上分散、思想上分歧的状态，而且要面对信心越来越强的保守和反动势力。早在 1848 年夏天，情况已经很明显，大众对于政治的兴趣在急剧下降。到了 11 月，明

显反动保守的勃兰登堡-曼托菲尔内阁 (Brandenburg-Manteuffel) 的组建, 以及普鲁士议会随即被解散, 也只是引起了轻微的抗议 [112, 114, 124]。

在另一方面, 混乱的经济形势让社会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在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萨克森 (Saxony) 地区, 民主运动以手工艺人和农村织布工为基础, 他们希望成年男子选举权制度能够确保实施社会改革, 并让他们更具有安全感。在德累斯顿 (Dresden)、莱比锡 (Leipzig)、开姆尼茨 (Chemnitz) 以及整个沃格兰 (Vogtland) 和埃尔茨 (Erzgebirge) 山区, 形势尤为紧张。在弗兰科尼亚 (Franconia), 激进的政治主张受到了不少地区民众的支持, 特别是在班贝格 (Bamberg) 地区, 反对巴伐利亚邦国政权的排他主义势力相当强大; 在纽伦堡 (Nuremberg)、沿美因河流域, 那里的很多民众受到商业资本主义和铁路的发展带来的威胁, 农民们也不愿向他们的前封建领主作出赔偿, 或不愿遵守森林法, 所有这些都密切关注着政治上更进步的莱茵兰地区。在黑森-达姆施达特 (Hesse-Darmstadt) 和符腾堡公国, 相当多的民众支持国民思想, 反对皇族专制。在巴登, 1848年9月爆发了一场由斯特鲁韦领导的起义, 尽管遗憾地失败了, 但却体现了国家政权不断垮台中的民众的心声 [89]。

正是在这些地区，1849年5月和6月爆发了对政治反动势力的最后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充分体现了继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拒绝承认法兰克福议会拟定的帝国宪法以及普鲁士代表的退出之后，民主派再次被王室和自由资产阶级背叛的苦澀无奈。抗议在四处蔓延，伴随着小规模起义，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巴登、莱茵兰-普法尔茨(Palatinate)、萨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这些行动主要由各地的人民政治社团发起，从统治当局的角度来看，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周边地区]和巴登的威胁尤为严重，他们在那儿获得了一部分军队的支持。在巴登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还成立了地方省政府。然而，像往常一样，民主派的布伦塔诺(Brentano)和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斯特鲁韦(Struve)在战术指挥上存在分歧，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其他起义则发生在普鲁士的莱茵兰——在纺织中心埃伯费尔德(Elberfeld)受到预备役士兵的轻微抵抗——然后蔓延到威斯特伐利亚和伊瑟隆(Iselohn)工业区。在德累斯顿，战斗持续了4天，近8000~10000人加入到起义队伍之中，250人死亡。萨克森政府不得不请求普鲁士军队支援以恢复统治秩序。这些抵抗行动彼此孤立，指挥能力又低下，面对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无法逃脱其失败的命运。法兰克

福议会的残余力量施展浑身解数，努力维持其在斯图加特 (Stuttgart) 的独立机构，并号召德国人民予以支持。到了6月18日，他们的会场被军队强行关闭，至此他们的努力宣告无效 [86, 92, 98]。

与德国相比，奥地利民众（不包括波希米亚）要求的民主和社会变革范围更广泛深入，革命运动仅发生在首都维也纳。在维也纳，学生发挥了远远比其他地方重要得多的作用，他们加入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当中，热切主张建立大德意志联邦，而奥地利则以某种尚不确定的方式并入其中。相比之下，工人更关心另一些问题，比如增加工资，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限制使用机器、学徒工和妇女，为病人和老人提供援助等。由市民、学生和国民卫队构成的中央委员会让运动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性和方向性。该委员会主张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支持成立制宪议会，并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救济计划，这些主张让政治自由派人士越来越感到震惊，并逐渐与之疏离。政府尽管不情愿，仍被迫逐渐作出让步。1848年5月15日，作为对示威活动的回应，政府承认了民众的选举权要求。5月25日，政府颁布法令，关闭维也纳各大学，并将大学生军团与国民警卫队予以合并，拒绝服从的学生们和工人一起开始建造街垒反抗，迫于形势，政府再一次选择了屈服。然而，由费斯科夫 (Fischhof)

博士领导的安全委员会的建立，仍表明了对皇帝身边大臣们的极端不信任。从5月下旬至8月中旬这段时期，政府确实相当服从这个委员会，这一阶段标志着激进的革命运动的最高潮。

各俱乐部、报纸和街上的焦躁情绪在增长，对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批评越来越常见，对皇帝本人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尊重。这让双方的分歧越来越突出：一边是关注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民主中产阶级分子和学生领导阶层，另一边是主要关心如何提高物质生活保障的工人。6月15、16日以及8月23日，集体抗议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工人被主要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国民卫队驱散。在第二起事件中，至少有6名工人被打死。

这大大削弱了民主联盟的力量。在整个8月、9月期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民众苦难加剧，这种两极分化更加明显。考虑到这一点，更激进的革命分子于10月3日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民主俱乐部中央委员会。危机终于在10月6日爆发，人们采取各种措施阻止军队前往匈牙利去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结果导致军火库被抢，国防部长拉图尔(Latour)将军被杀。在这种形势下，同时为了避免进驻维也纳的士兵受革命者煽动，军队被撤出维也纳。在这样一个极端混乱的局面中，在没有合法的权力机构的情况下，学生委员会以及更激进的

民主俱乐部中央委员会于是通过由费斯科夫、陶森瑙 (Tausenau) 和哈布罗斯基 (Habrowsky) 三人执政, 接管了维也纳的行政控制权。他们试图组建国民卫队和学生军团的激进分子, 加上工人和逃离军队者, 一起保卫维也纳城, 抵御不可避免的军事镇压。他们只有 3 万~4 万名保卫者, 陷于奥地利其他地区的包围之中, 他们唯愿匈牙利人民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军队, 或者法兰克福议会代表出面进行调停。然而这两者都无法实现, 在 10 月份的下半月, 在温迪施格雷茨 (Windischgrätz) 指挥下, 7 万部队在维也纳周围集结。从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1 日, 随着军队重新掌控局面, 近 2000 ~ 5000 名起义分子被杀害 [89, 143]。

法兰克福议会讨论了 4500 万德意志联邦居民的未来, 其中约 1200 万人生活在德国统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西部省份。在很大的程度上, 对新德意志帝国边界的辩论已经包含了是否会被普鲁士或奥地利控制的问题。然而, 考虑到它所宣称的德意志认同感, 而且其成员经常声称拥有优于斯拉夫人的种族优越感, 大会几乎是必然会拒绝将哈布斯堡王朝广大的非日耳曼语地区纳入德意志帝国, 有一些地区例外, 德国人认为他们对于这些地区有一种“历史所有权”, 比如波希米亚地区。这样, 他们就可以提出一整套复杂的历史、法律、经济、文化

和种族等理由，证明其领土要求有理有据，反过来就可以忽视捷克从民族和语言角度的领土宣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民主派，都很快地撤回了对波兰独立等事业表示的所有同情言论，并声称他们支持普鲁士波兹南地区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日耳曼人，对于在丹麦统治之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也作出同样表态 [131, 132]。这一切都支持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如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 (Namier)，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著作中着重指出了法兰克福议会具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特性 [17, 110]。

大德意志的梦想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奥地利保守派，甚至是许多自由主义者的质疑。这两个阵营对弗里德里希·威廉觊觎普鲁士的野心日渐洞悉，两者都不愿将哈布斯堡王朝任何一部分领土的主权交予新的德意志国家。那些支持大德意志帝国的维也纳激进分子，曾以为大德意志能够保证他们拥有政治自由，推行社会改革，结果却证实了他们心中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然而，作为奥－德联盟的人，他们也敌视意大利和匈牙利诸省的独立主张。从总体上看，他们似乎并不能理解，即对于非日耳曼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德国统治的终结。而且，维也纳的民主派也的确欢迎对《人民之友报》所称的“那些愚蠢而邪恶的捷克斯拉夫人政治团体，那些妄想

将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帝国，损害日耳曼人利益的捷克人”进行军事打击。各民族之间的这些分歧被奥地利当局进行了有效的利用 [124, 143]。

在波希米亚，现实情况是，一小部分激进分子在坚持捷克文化的独特性，并要求捷克语和日耳曼语的平等地位，以及捷克人民更大的自治权，同时又强调他们忠于奥地利王室。这些诉求得到了中间和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商人、手工业者，尤其是知识分子，这些团体具有一种捷克民族的认同感，憎恨日耳曼人在商业和其他各行业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又不满足于德国人主导的政府机构对他们的统治。

1848年3月的维也纳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被布拉格所模仿，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捷克人和德国人组建了国民警卫队，保护民主自由和秩序，还建立了一个学生军团、多个政治俱乐部，出版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圣·瓦茨拉夫 (St Václav) 国民委员会组织的请愿活动。正焦头烂额的维也纳政府于4月8日致该委员会答复函，对其中的多数条件予以承认。同意在官方语言和教育领域中，捷克语享有与德语同等的地位；它还承诺在将来某个时候建立一个对波西米亚议会负责的政府机构，但推迟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三者组成联合政府的决议。随后由于德语区民众

的反对，加上许多捷克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捷克人民族意识有限，使奥地利很容易将这些承诺一点一点地削减殆尽。正如帝国其他地区的人那样，对于波希米亚乡下民众来说，“自由”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拒绝履行封建义务。

尽管如此，德国人还是担心失去在帝国中的主导地位，当捷克民主运动主要发言人，历史学家帕拉茨基（Palačký）拒绝了法兰克福议会对波希米亚代表团的邀请，以及在6月2日—12日在布拉格召开斯拉夫人大会时，德国人感到相当震惊。他们对捷克人的诉求表现出一种屈尊俯就而又混杂着蔑视的心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应为典型，他们拒绝了捷克人民要求获得全新的“历史存在”的权利。帕拉茨基青睐的选项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内改善捷克人的地位，他认为，这样一个哈布斯堡帝国可以单独为捷克提供保护，使之免受德国或俄罗斯任何一方的控治。4月13日成立了国民委员会，以向王室统治者递呈请愿书，不久日耳曼人代表就退出了该委员会。很快地，在这个委员会中，像帕拉茨基这样的捷克中产阶级自由派明显流露出了对捷克出现广泛的人民运动的恐惧。随后出现的一股罢工浪潮，对面包店和犹太商人进行了攻击，这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他们拒绝接受在各地建立委员会网络、展开组织

宣传并与统治当局进行斗争的激进主张，因为这会挑战帝国王权。然而，尽管作出这些绥靖姿态，形势仍在不断恶化。3月份，布拉格的军事指挥官鉴于维也纳和米兰军事行动的经验教训，将军队从城区的大部分区域撤离，退到布拉格周围的山坡上：城堡区（Hradčany）、雷德纳山（Letná）、佩特林山（Petřín）和高堡（Vyšehrad）。然而，5月20日，布拉格驻军司令温迪施格雷茨从维也纳返回，这个家伙出身名门望族很不招人喜欢，就像其他维也纳高级军事指挥官一样，他并没有打算将捷克民众的政治要求当回事，他加强了军事活动，包括经常性的街头巡逻，这完全忽视了布拉格市民的感受。人们担心这是一些军事准备工作，是想要重新恢复对布拉格控制。最终，在6月12日，民众举行了抗议活动，并与军队发生冲突。大约1200～1500名起义者在中央老城和新城的狭窄街道上仓促构筑起街垒，但这些人的行动迅速在军队的炮火轰击中结束。有43人被打死，其中至少有29人是手工业工人。63人受伤，当中有11名学生和1名商人，同样，大多数起义者是工人。

这一事件给当局提供了一个借口，禁止国民委员会的一切活动，并无限期推迟波希米亚国会的选举。7月22日在维也纳召开立宪议会，这成了捷克人争取自治权的最后机会。在那儿，帕拉茨基提出的帝国联邦设想遇

到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就是讲德语的激进分子，他们将社会改革诉求与大德国沙文主义结合在一起，常常表现出歇斯底里的反斯拉夫情绪。帕拉茨基领导的捷克代表团以及知名人士弗兰蒂谢克·里格 (František Rieger) 都表示完全支持内阁大臣们的提议，并希望他们在考虑自己的提议时能够予以适当的让步，以此作为回报。在政治上，他们是温和的立宪主义者，害怕出现混乱；在关系到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他们是不干涉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是优秀的律师，也是受人尊敬的有产者，他们支持对封建特权的丧失作出补偿，对平息 10 月维也纳暴动的做法表示欢迎。但是他们的妥协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然而，尽管在体制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1848 年波希米亚所经历的事件还是让捷克的民族意识有所觉醒，并把另一问题摆到了哈布斯堡帝国王室的议程上，当然，它与帝国的其他地方，即意大利和匈牙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形势相比，看起来肯定处于相当次要的位置 [140, 141, 14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意大利，维也纳“三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在奥地利控制下的各省以及各独立邦内都激起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在各独立邦内，民众要求以法国 1830 宪法为模板进行宪法改革，赋予民众一定限度的选举权，而在各省，则要求将奥地利军队驱逐

出去。奥地利统治力量显然即将崩溃，因此查尔斯·艾伯特 (Charles Albert)、皮埃蒙特 (Piedmont) 国王、教皇庇护九世、那不勒斯国王和托斯卡纳大公大胆地委派军队，将他们最终逐出了意大利，赶回到阿尔卑斯山另一边。他们出于个人野心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回应来自自由主义精英们（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众多压力：他们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同时保护自身免受刚获自由地区的共和运动的威胁；那些地方的民众正在谈论男性选举权，政治自由以及仍然模糊的社会公平理想。广大的劳动阶层民众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却很快又变成了意大利统治阶层的一个“致命威胁”[凯沃尔 (Cavour)]。当然也有可能，就像 18 世纪 90 年代那样，法国革命政府会进行干涉（事后想想，这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法国共和政权想避免惹出国际纠纷），出于这方面考虑，意大利领导人坚持表示，意大利可以解放自己 [153、156]。

由意大利各城邦发起的这一运动以惨败告终。各邦领导人相互之间的猜疑很快就表露无疑。早在 4 月 29 日，教皇庇护九世被指使出面谴责这场战争，担忧它对社会秩序和天主教世界的团结造成双重威胁。他的威信因这一举动而大打折扣，在罗马，要求全心全意支持民族事业的压力在进一步加大，庇护九世被迫于 11 月 24

日逃到那不勒斯加埃塔 (Gaeta) 港避难，自此他开始对自由主义横加指责，并要求他的臣民服从他的指挥。这导致罗马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激化，在 1849 年 2 月，由全体男性选民普选产生了一个制宪议会，成立共和政体，并不再承认教皇的世俗权力。7 月，该政权被路易·拿破仑派遣的法国军队倾覆。拿破仑派遣法军前来，想要恢复教皇地位，主要是想借此加强天主教对他自己的政权的支持 [152]。反奥地利联盟力量也已开始削弱，1848 年 5 月，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大公感觉已有足够信心，可以不再理会自由派的批评，于是召回北部的军队镇压了大陆本土的革命，然后攻打西西里岛，其首府巴勒莫曾爆发了欧洲的第一场革命，于 1849 年 5 月 15 日陷落。

因此，反抗奥地利军队的军事行动主要来自皮埃蒙特，但是在 1848 年 3 月，查尔斯·阿尔伯特在一开始犹豫不决，让奥地利指挥官拉德斯基得以喘息，继被逐出米兰后能够重新集结他的军队，做好增援并掌握主动，在此过程中，他并没有理会奥地利皇帝所派代表正在举行的谈判努力（出于对意大利战争所牵涉的财力和人力的担忧）。而且，另一特征很快地显现出来，那就是，对民族主义事业的支持——与强烈的反奥地利情绪截然相反——相当有限而且常常带有附加条件。尽管农民对 3 月份的城市起义颇多支持，并且在随后的事件中

也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威尼托，广大的农村知识阶层——神职人员、各行业工人和商人等——招募农民组成本地民兵支援革命，然而，事实上由有产者阶层主导的米兰和威尼斯的革命政府本质上根本不愿意作出重大的农业改革，再加上皮埃蒙特的军队在转移到伦巴第平原时，征用了很多粮食物资，让大多数农村人避而远之，使革命运动陷入孤立，局限在城市之中，无法向农村发展。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共和派人士——比如威尼斯革命的领导人曼宁——来说，那些随后出现革命的社会抗议，以及类似1848年6月巴黎发生暴动这样的消息只会强化他们内心本就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想 [149, 150]。1848年7月正规军队在库斯托扎 (Custozza) 失败之后，主张革命的马志尼号召发起一场人民战争，但起义并没有受到多少民众的支持，因为号召大家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进行暴动的口号过于模糊，缺乏明确的社会改革承诺，只是让大多数有产者更加忧心忡忡。

7月25日，由于皮埃蒙特军队的无能，拉德斯基得以在库斯托扎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并在8月9日结束战争，这充分暴露了查尔斯·艾伯特的意图，即放弃伦巴第和威尼斯，任人宰割，以此换取奥地利人不进入皮埃蒙特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理想完全破灭的米兰人不再做任何抵抗，开城投降。查尔斯·艾伯特后来

在1849年3月再次与奥军开战，企图重新树立他的王朝的声望，结果在诺瓦拉（Novara）招致更大的耻辱，并被迫放弃了王位 [145]。这种形势最初影响到了一些中产阶级革命民族主义团体，其激进主张昙花一现。在热那亚，由于众多手工艺人和码头工人对于在奥地利占领下的生活前景感到痛苦，在他们的支持下，战争还要继续。在佛罗伦萨，事态的发展与此类似，而在罗马，马志尼和加里波第（Garibaldi）领导下的起义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然而，更具重大影响的是皮埃蒙特的最终战败，主要障碍被消除，奥地利重新恢复了统治地位，随即出现了一股镇压控制的浪潮，教皇国大都再现了这一过程。尤其在那不勒斯，15 000名被怀疑是反对君主制的支持者被逮捕入狱。只有威尼斯，借助于其水城泽国的地理优势，尚在坚持抵抗。但它遭到奥地利军队更为有效的封锁，由于食物供给消耗殆尽，社会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而且中产阶级对社会动乱的担心也在上升，最终在1849年8月22日威尼斯被迫投降。8月27日，在一群匈牙利士兵的引领下，奥地利帝国军队重新进入威尼斯城 [150]。

维也纳中央政府的垮台让塞切尼（Széchenyi）和科苏特（Kossuth）——现代主义者，渴望建立一个自由的工业化的社会——这样的匈牙利人得到一个实现其抱

负的机会，他们先前就曾鼓动民众向奥地利王室争取在哈布斯堡帝国内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同时还提出了模糊而有限的土地改革措施，借此争取众多民众的支持 [134]。1848年4月，匈牙利议会向皇帝提交宪法议案，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废除农民劳役和什一税——并予以补偿——废除贵族纳税特权，并提出建立一个自由政体，根据财产状况确立选举权，这一规定让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具有了投票权。所产生的其中一个结果是，确保了在6月选举后成立的新议院中，相对较大的贵族阶层可以继续掌握主导权，在议会中74%的代表都是贵族（有头衔或无头衔），在郡级行政机构也是如此。另一个结果就是让匈牙利拥有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由于哈布斯堡帝国很显然地徘徊在崩溃的边缘，而且帝国大部分军队都陷在意大利，维也纳当局清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提议 [145]。驻匈牙利总督，代表奥地利皇帝的大公斯蒂芬（Stephen）指定巴蒂安尼（Battyány）为匈牙利总理，他是该国最富有的地主之一。然后巴蒂安尼又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完全由地主贵族代表组成的部长人选名单。在坚决抵抗奥地利当局对新成立的匈牙利自治体的威胁方面，他们团结一致，对于来自匈牙利王国疆土内部的、影响到他们优越地位的威胁，也是如此。这种威胁可能来自少数族裔，他们急于维护

他们自己的“自由”；也可能来自少数政治激进分子和城市工人，他们渴望进一步推进社会和政治改革；或者来自农民，这更加危险，他们对限制其进入公共土地和森林的权利感到不满，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攻击地主和犹太商人的现象。对贵族地主来说，那种影响深远的、能够让农民献身于对新政权的支持之中的土地改革是不可想象的。

维也纳的让步让奥地利和匈牙利王国上层精英之间原先通过个人联姻形成的融洽关系随即自然地保留了下来。然而，在金融、外交政策和军队等方面的责任分担的有关协议仍然处于危险的不明确状态。随着奥地利政府的军事形势开始好转，很显然地，对于匈牙利领导人来说，必须采取更多激进的自我防卫措施，才能继续保有自治权。而且在这个阶段，许多较为富裕的贵族在逐渐放弃民族独立事业，他们与奥地利宫廷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匈牙利大民族主义主张也带来了不利的影晌，它激起了非马扎尔族群体，特别是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族人的反抗，他们反对马扎尔族人努力推行的语言和行政一体化举措。这些群体都对奥地利帝国暗示要赋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废除封建主义做出了积极响应。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很快就演变成了暴行和反暴行的恶性循环 [137, 139, 146]。

一旦感觉已经强大到足以采取军事行动，与奥地利政府的斗争就几乎不可避免了。由德-奥主导的帝国官僚当然认为，匈牙利改革者们索要的自治权超出了帝国生存能够接受的极限。从1848年6月中开始，奥地利王室指使以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 (Jelačić) 和其他克罗地亚贵族为主的势力，抵制匈牙利马扎尔人的权利主张。事态迅速发展，一触即发。7月，科苏特要求国会拒绝再派遣任何匈牙利军队去镇压意大利起义，并通过决议招募军队保卫匈牙利。8月31日，奥地利政府颁布法令，取消匈牙利财政部和国防部。9月11日，革命群众挫败了匈牙利总督企图夺取布达佩斯市控制权的图谋，9月21日，经匈牙利议会选举成立国防委员会，在科苏特的领导下，成为实际上控制匈牙利的政府。9月28日，奥地利政府使者，伦贝格 (Lemberg) 伯爵在佩斯被刺杀，让本已紧张的局势更是火上浇油，奥地利政府随即颁布法令，解散匈牙利议会，宣布其决议无效，并实施军事戒严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代表匈牙利社会精英的议会感到，它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外部力量，而不是来自于国内的革命，这与其他国家的自由派人士同在1848年成立的议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前帝国军人（约50 000人）以及新招募的团员（截止到1849年6月为止约120 000人）组成的匈牙利

军队最初成功地抵制住了耶拉契奇的多次进攻，并于10月30日推进到离维也纳仅几英里的地方，但它未能给维也纳城内的起义者提供救援，导致两天后维也纳革命最终失败。再加上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成功镇压了当地的起义，这意味着奥地利政府将集结大量的军队来对付匈牙利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结果，在12月，匈牙利政府和议会被迫放弃布达，以马车和手推车满载物资，经过缓慢而艰苦的跋涉撤退到德布勒森（Debrecen），位于大平原上的一个大村庄。在那儿，因失败而日益严重的挫折感，以及招募战士、筹措资金中的实际困难，让革命队伍分化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支持和平谈判的声音在增长，但奥地利军队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妨碍了进一步谈判。而且，似乎并未大势已去。1849年4月，奥地利军队再次被从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驱逐了出去，这一溃败让奥地利指挥官惊慌失措，只好建议奥地利王室忍辱负重，接受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援助。沙皇听说巴黎发生二月革命的消息，立刻在部分军队中进行了动员，做好了干涉准备，因此一接到新即位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的公开求助呼吁，“进行神圣斗争，抵抗无政府状态”，他们立刻就出发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干预几乎没什么必要，因为匈牙利军队已经越来越疲惫不堪。

在这种情况下，科苏特也无法打消越来越多人相信战争已经输了的看法，实际上，从8月至10月，匈牙利军队要么被打败，要么被迫投降。1848年革命最终宣告结束。各方人员伤亡极其惨重。据信大约50000匈牙利人被杀害，奥地利人也差不多。匈牙利投降之后，约120名主要人物被处决，凡发现手持武器者也同样一概杀死，具体数目不详。另有超过150人被判处10~20年的监禁。此外，尽管只有500名俄罗斯人死于战斗中，但有超过11000俄罗斯人死于霍乱 [135, 139]。

各国革命似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让自己离更平等的社会前景更近了。东部国家则向让少数民族族群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迈进了一步。然而，在支持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人士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于采取哪些积极措施的约定。自由主义者、民主派、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曾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使得革命很难调动并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村人口的支持。城市工人对社会改革的普遍关注感、阶层认同感当然有所提高，但即便如此，对行业协会和地方群体的忠诚度还是要强烈得多。所推行的，或者似乎只是预期的这些社会改革措施产生的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引起了巨大的并不断增长的反对之声，这种反对不仅来自旧社会的精英，还来自大部分有产阶级，他们只要一点点的宪法改革就可以满足，却被四处蔓延

的混乱局面和社会革命的威胁吓坏了。而且中欧和东欧的旧政权通过最终废除封建制度，相当成功地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再加上明显的分歧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左派的软弱无能，这都为反革命势力的登台铺平了道路。

第五章

反 革 命

通过事后回顾，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保守势力对革命变化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享受着革命成果。首先，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任命新部长时，革命力量给现任君主保留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包括在所有情况下对官僚机构和军队的控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及12月继位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都被赋予最终决定权，并受到其贵族顾问们的一再唆使。在普鲁士，例如利欧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这样的副官长，以及克莱斯特·瑞操（Kleist-Retzau），扬·贝洛（von Below）还有年轻的俾斯麦等容克贵族，都是极端的反自由主义者，都受到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作为一名士兵具有的忠诚感的教导影响^[98]。即使在法国，大部分旧官僚，特别是军官队伍也一直保留着原有地位。巴黎的六月起义吓坏了民主选举产生的制宪议会，促使他们任命保守的共和派人物卡芬雅克将军为政府首脑，随后又在12月，推选觊觎王位的波拿巴主义者路易·拿破仑担任共和国总统^[49, 67]。

旧的社会精英们很快就从一开始因现有政府机构的明显垮台而产生的沮丧中恢复了元气。他们拥有更为优越的社会和文化感知，当他们的地位面临威胁时，越来

越认识到团结的必要性；在行政事务和军队的地位根深蒂固，政治经验丰富，这都让他们受益匪浅。此外，他们还控制着大量的机构资源，并能够凭借其地主、雇主在当地政府任职的身份施加影响 [50, 66, 124]。在 1848 年特殊的环境中，要想恢复他们的权力似乎需要作出重大努力。在普鲁士，1848 年 5 月选举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大多数保守派人士对此坚信不疑，于是，1848 年夏天见证了遍及农村地区的拥护君主制者协会的创立，以及一个合作性的“保护所有各阶层人士之财产并促进其福利协会”，即所谓“容克议会”，并于 8 月在柏林召开了会议。由格拉赫、俾斯麦和瓦格纳主张创办的新报纸《十字报》为协调行动提供了另一个根据地，该报纸谴责成年男子选举权主张，要求以“利益”代表取而代之，推崇普鲁士排他主义、基督教新教的虔诚性和反犹太主义思想。对农民作出的种种让步，同时夸大形容左派对财产、宗教、家庭和民族的威胁，这一切都有助于保守势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在城镇里，“普鲁士联盟”则呼吁中下阶层和工人向国王表示忠诚，并煽动他们对自由派和民主派首脑人物的人身和财产进行攻击 [91]。

在德国奥地利，情况也非常相似，最迟到了 9 月，随着对农民作出的让步，再加上各种“影响”，多数农村人口对革命变得冷漠甚至持敌视态度，有效地孤立了维

也纳革命分子 [143]。与这些努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翼革命者推出的为了赢取农民支持的举措普遍考虑欠妥。在法国，只是在巴黎革命运动已被镇压，并且波拿巴在 1848 年 12 月大选中令人震惊地获胜之后 [70]，革命激进分子才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在占据多数的小城镇和农村选区战胜了保守势力 [34, 51]。在各个地区，尽管信仰新教的普鲁士邦和它的罗马天主教之间关系紧张，教会一直都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所在，并试图根据其自身利益操纵政治局势。在德国，包括支持成立“天主教庇护协会”这样的群众组织，都与此有关。在各地，神职人员力图对教育施加更大的影响。多数左派力量的反教会主义可能对此趋势束手无策，正像 1848 年教会的保守主义强化了反教会的情绪一样 [89]。

这些既定的精英进一步加强了其影响，因为所有社会群体对和平与社会秩序的渴求与日俱增，看起来这种和平秩序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中产阶级，被激进的宣传和对他们财产的显然威胁吓得不轻。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似乎被巴黎六月起义所证实。在法国，许多温和的共和派，在其他地方则为宪政自由派——本质上只希望通过有限度的宪法改革，实现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随着事件的发展，他们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在维也纳，自由派诗人格里尔帕策 (Grillparzer) 在 1848

年6月8日发表了一首题为“致陆军元帅拉德斯基”的诗，向他发出呼吁，“请打回老家”。与政府独裁主义相比而言，对法治的主要威胁似乎越来越多地来自于那些被保守媒体斥之为外国势力的代理者，让青年堕落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正在诱导没什么政治修养的广大民众误入歧途。社会和种族分歧迅速摧毁了民众最初的改革热情，以及不同支持者之间的团结意识。由此出现了一个政治分化过程，原先支持有限度改革的大多数人选择了保守而非激进的结果作为后革命危机时期的基本社会形态 [55, 119]。

旧精英能否继续掌控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对于随后发生的冲突走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自由派的内阁部长们和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试图控制军队，但措施太过软弱无力，遭到抵制。也没有任何地方出现军官大清洗现象。虽然组建或扩大了由平民构成的国民卫队，参加者的动机各异——一些激进分子想要替换军队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更常见的则是中产阶级人士试图协助维持社会秩序。总之，无论是他们还是叛乱分子都难以和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匹敌，后者具有明确的目标。而且，作为迫不得已的手段，士兵通常也可以更有效地采取暴力措施，在巴黎、布拉格、米兰、维也纳、柏林、德累斯顿和其他许多地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军

队就是为反革命运动准备好的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军队的军官团，主要由贵族构成（法国有部分例外），都被灌输忠于国家这一制度化思想，但在解释方式上与他们阶级出身的利益一致，而且他们承诺致力于捍卫“基督教文明”和既定的社会秩序 [37]。普通士兵则服从于军事纪律，与他们出身社区隔离，孤立于政治论辩之外，在总体上被认定忠于自己的战友，并拒绝政治煽动者的呼吁。面对充满敌意的人群，他们通常服从军队上级的命令 [58]。

这在奥地利尤为明显，在那里，贵族出身的军队指挥官温迪施格雷茨、施瓦曾伯格、拉德茨基和耶拉契奇在恢复维也纳和帝国其他省份的王室权威过程中就扮演了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尽管 1848 年 3 月革命后许多编制单位的军队立刻出现了纪律管制方面的危机，以及普遍的擅离职守事件，尤其是驻扎在各自本国内的意大利和匈牙利军团，大多数在编制的军队仍继续效忠于帝国，证明了他们的指挥官出色的职业水准，尤其是将招募新兵极好地与军事单元融为一体并与普通民众隔离的整合效果 [136, 145]。由于同样的原因，让他们能够在遍布整个欧洲集结大量军队，炫耀强大武力，威慑潜在对手，并在叛乱地区以残酷的武装镇压恢复控制权。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也采用了大规模军队编制来对抗其他正规部

队，在这些情形中，帝国军队逐步显示出胜利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敌人在战术领导和控制方面具有更大的不足之处所致。在德国和法国则相反，他们主要用于镇压国内平民叛乱分子，以重新获得对城市中心的控制，1849年在德国西南部、1851年12月在法国东南部则以机动小分队方式对付农村叛乱分子^[52]。

正是在这种日趋保守的政治共识，加之军事上的支持，让一系列反革命措施可以成功地推行开来。保守派精英们采用多种复合的非正式手段来施加影响，必要时也强迫商人、工人和农民予以接受。宣传称“赤色分子”企图通过疯狂的抢劫和谋杀来摧毁整个社会。选举系统被操纵，可疑的地方官员被清洗，报纸和会议场所被查封，激进分子被恐吓。这些措施的效果非常明显，在许多地方，激进的政治运动和反对政治保守的势力被解散。在法国，紧接着六月起义之后，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持续加压政策。以卡芬雅克为首的保守共和政府成立之后，立刻颁布了多项措施，严格限制政治俱乐部的活动（1848年7月28日）和新闻出版自由（8月9日—11日）。但是多数保守派认为这些措施过于温和。11月4日，制宪会议通过了一部宪法，该宪法回避了对六月起义前讨论的改革措施作出任何承诺。他们现在试图建立的共和政体是一个完全废除了福利制度的自由民

主体系。然而，成年男性选举权仍予以保留，这归功于一个激进（民主—社会主义者）运动的继续存在，而这也让保守派感到高度焦虑。幸运的是，宪法还准备选举一位总统，作为秩序维护者，他将被赋予广泛的行政权力[49]。

结果，在1848年12月10日，随着伟大的拿破仑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为总统，社会向保守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他的主要资产无疑就是他的名字。这一名字让他与对拿破仑皇帝的崇拜以及一个更繁荣、幸福和荣耀的年代的传奇联系在一起。铺天盖地的书籍、小册子和版画，让这位皇帝一直活在法国人的心中，而那个传奇年代更是与当前这个似乎一直伴随着共和体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年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的苦难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一开始，大多数保守派领导人和报纸都反对让波拿巴作为候选人，然而，形势陡转，波拿巴很快有吸引大量选民支持的可能，尽管选民们经常被其所处社交领域的顶头上司劝导应该投票给谁，这一现象颇令人震惊。保守派领导人和报纸候选人也识时务地从最初的反对者摇身一变成了合格的拥护者。由于彼此之间无法达成协议，推出一个有可能击败他的候选人，保守派政治精英们越来越多地开始支持路易·拿破仑。他似乎比较软弱，就像一

个小丑，他们可以进行操纵。而且他似乎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最起码他的当选可以阻止共和政体被进一步巩固。先前与七月王朝有关的那些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马累、巴罗、布若元帅，尤其是梯也尔，他们的角色至关重要。卡芬雅克，唯一现实的另一替代选项，本质上却是温和的共和派候选人。虽然他在镇压六月起义中的表现吸引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支持，对于大多数支持君主制的贵族人士来说，他仍然有太多的共和派特质。许多激进的共和党人也反对他当选，称他是“六月屠夫”。另有许多共和党人，因为相信伟大的拿破仑皇帝延续了革命事业，故此也看不明白投票给他的侄子并不符合他们的共和原则。这是那个政治独裁者传奇的巨大影响所在。这使路易·拿破仑看起来被所有人喜欢，成为一个超越党派斗争之上的人物形象。他在12月的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36, 67]。

从镇压六月起义开始，法国的反革命过程在1851年12月波拿巴发动的政变中达到了高潮。这既是波拿巴个人野心的表达，也意味着保守党政府一心想要镇压、彻底消除激进组织及其宣传的失败——其中大部分只是简单地被赶入地下，而且人们越来越坚信，尽管对选举权作出了新的限制，激进的共和党人仍有可能在1852年的选举中获胜。对于大多数保守派来说，独裁政府似

乎也是可以接受的，而反对政变者的规模并不大，让他们增强了这一感觉。在各主要城市——受到明显的军事准备的震慑——这种反对活动很有限，但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在法国中部和东南部乡村地区，参与者包括手工艺人和农民，通常由中产阶层行业人士领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基本上局域化的叛乱很容易被军队镇压。紧接着就是保守派人士朝思暮想的对左翼人士新仇旧恨的最终清算。共和党领导人或被逮捕，或被迫流亡，或受恐吓而不敢有任何动作。这些适逢其时的抵抗运动似乎在表明政变有理，它现在可以被看做一种预防措施。在随后的全民公决中，选民被要求批准总统的行动并扩大他的权力。据称，这是在文明与野蛮、秩序和混乱之间作出选择。750万人投票“同意”，64万人“反对”，150万人投了弃权票，反对声集中在各主要城市。尽管气氛很压抑，毫无疑问，大多数法国人认可了这一政变，并期待着帝国的重新崛起 [52, 74]。

加强军事力量与回归独裁政府两者结合，这一现象在那些曾经经历过革命的地区非常明显。这可以从各国君主对内阁部长的任命中看出来，很显然这些部长并未得到议会的信任。1848年11月，在奥地利，凯旋的温迪施格雷茨提名他的小舅子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 (Felix Schwarzenberg) 亲王出任首相，施瓦岑贝格就此

走上了政治前台，他致力于奥地利君主政体的现代化、中央集权化和德意志化，但他又相当现实，意识到有必要对中产阶级做出一些让步，满足他们的参政议政的愿望，同时还要照顾到民主主义者的情绪。紧接着在12月，奥地利皇帝斐迪南德宣布退位，让位于年轻的弗兰兹·约瑟夫，由于这一变动，先前作出的所有让步可以轻易地被否决，因为新皇帝并没有宣誓维持这些举措。象征性地，他自称是“承蒙天恩的皇帝”——一个被他的前任斐迪南德在3月份废弃的姿态。

被放逐到克莱姆西尔(Kremsier)的小镇摩拉维亚(Moravian)的奥地利议会继续讨论新的帝国宪法。这部宪法将包括这样一些条款，比如废除贵族称号，削减教会的地位，并赋予地方各省更大的自治权；作为对各民族的让步，皇帝的权力则被限制在只具有暂停否决权。对于弗兰兹·约瑟夫而言，所有这些都完全不能接受。议会越来越多地被内阁部长们忽略。1849年3月7日议会终于被军队遣散，这一结局并不意外。在同一天，弗朗茨·约瑟夫宣布实施新宪法，连同一纸权利清单，规定君主拥有否决所有立法的绝对权力，废止部长对议会负责制，限制选举权，削减匈牙利自治权，以及加强中央行政管辖权力。这种反动保守的动作被意大利各省和匈牙利的军事法院作出的判决进一步加强，在这

些地方，当众鞭刑和绞刑被认为是在维护奥地利统治，但这丝毫不能让勉强服从的臣民增加对该政权的拥戴。在19世纪50年代，年轻的皇帝为了表明自己的威权，颁布了更进一步的反动举措，以取代代议机构于1851年12月31日颁布的《西尔维斯特特权法案》(Silvester Patent)，提高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853年与罗马教廷的协约)[135, 143, 145]。

在普鲁士，1848年9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做出了一系列动作来恢复他的权威，任命兰格尔为柏林军事指挥官，并把军队调回首都，建立以刚从波森恢复秩序归来的普富尔将军为首的非议会政府，取代自由的汉泽曼内阁。10月中旬，普富尔又被曼托菲尔和勃兰登堡大伯爵接替，后者正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私生子，二人都决意重新建立秩序，维也纳革命被粉碎让二人大受鼓舞。该届政府的初步反应之一就是颁布命令，将普鲁士议会迁至勃兰登堡的一个偏远小镇，美其名曰保护它免受广大民众压力的影响。那些代表们企图在柏林开会，结果被军队遣散。各省的抗议示威和举行税收罢工的号召几乎没有影响。大多数中产阶级自由派急于避免可能会激起大规模起义的举动。12月5日，议会最终被解散，由国王下旨颁布新宪法。在新宪法中，仍然觉得有必要对自由主义观点作出一些重大让步，比如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结社权利，由议会对预算进行控制，自主独立的公民拥有选举权，等等，但不涉及国王特权这一关键问题。

尽管反革命势力取得了不少进展，在 1849 年 1 月举行的选举中只有少数保守派主要人物当选，此后在 1849 年 5 月 30 日颁布了一部新的选举法，建立三级体系，其中选民根据纳税高低被安置在其中某个选民社团（分别包含选民总数的 5%、12% 和 83%），每一社团选出人数相等的代表——该体系旨在确保富有的保守派（王国东部的地主，西部诸省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居于主导地位。允许“几类人拥有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实际重要性相称的影响力”^[95, 98]，让这一体系拥有了充足的理据。紧接着在 6 月进行了选举，其结果毫无疑问是保守派取得了胜利，组建了由大地主（22.5%），大资产阶级（5%）和高级官僚（49.7%）构成的下院。毫不奇怪，它热情欢迎 1850 年 1 月 31 日的宪法修正案，该法案恢复了国王对所有立法的绝对否决权，授予国王颁布命令统治国家的广泛权力，并废除议会驳回税收补贴的权力。普鲁士国王重建其权威的过程对德意志帝国其他各邦造成了重大影响，让普鲁士军队从中解脱出来，投入到镇压民主党人在萨克森、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之中。在 1849 年的整个 6 月和 7 月初，只有在巴登，

普鲁士军队可以说是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起义者大约有45 000人，其中包括2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89]。因此，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态已经再一次发生改变，因为民选议会的权力被大量削减，而且行政和军事镇压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妄图抗议者。

第六章

结 论

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上的响应过程极为复杂。不同社区、不同社会和文化群体各自发展出他们认为能够适应所处环境的政治风格。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简单地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来解读 1848 年历史是一种极度的过于简化，尽管几乎必然存在着阶级冲突。于是，在众多不同的革命的早期阶段，当中产阶层人士要求参与政治议事的时候，工人和农民却在努力要求获得经济保障，别无他求。后来，所有这些群体中的许多成员都逐渐渴望回复到“正常”，希望秩序能够恢复，社会能够繁荣。这加强了现有的社会精英们推行反动保守措施的能力。同时，这些群体的其他成员则在继续反对政治保守，直到抵制的代价变得过于高昂而难以承受。民族主义，虽然远没有预想的那么激烈，却是另一个造成社会分裂的情感伤口。因此，很显然，不可能假设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是，把政治活动归结为个体心理状态的随机集合，这样的结论也是不理性的。

短期内最为明显的保守政治举措就是增强了镇压力度。限制言论自由、结社和出版权利的立法被实施和加强。在有些地方实施了军事戒严，因为地方当局当心，

那些被当局视为犯有煽动骚乱罪的人会利用保留下来的合法权利来妨碍这些去政治化过程。从长期来看，警察治安网络得到了加强，警察部队的扩大，能够让政府对潜在的麻烦制造者进行更多持续不断而高效的监督。这一措施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就是减少了抗议人群与军队发生冲突的机会。由于军事谋略和武器装备所限，这些冲突常常导致暴力升级，有可能出现二月革命这样的不良后果。然而，作为最终手段，仍然可能借助军事力量让抗议者付出重大代价。此外，铁路和电报改善了交通通讯条件，使得快速集结军队日益成为可能。

另一个长远的战略就是推动更有效地将潜在的对社会不满的群体整合到不断变化的政治体系之中。高压统治的同时还结合了意识形态上的操纵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1848年见证了多个国家的行政和强制力的崩溃，正是由于那些掌控政治权力的人普遍失去了信心的缘故。最初阶段的崩溃之后，基于对革命的恐惧，随即就形成了新的保守主义共识。为了保存这一共识，已站稳脚跟的精英们显示出愿意承认一些有限的政治权利的姿态，同时维持对官僚和军事机构的控制权。在一些存在着多种不同派系的社会体系中，如法国、德意志联邦和奥匈帝国，经扩大后的选举权，连同代议制度一道被保留了下来，但对参政者的权利作出了严格限定。其目标仍然

是遣散不利于保守主义的政治组织。即便如此，大家都心里清楚，时光不可能倒流，不能一味地让一切都回到过去。多数人的政治意识已被唤醒。无论他们有多顺从，更多的人已开始相信，政治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毫无疑问，其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会陷入对它漠不关心的状态，但很多人至少会继续时不时地关注自身所处社会圈子之外的事务。通讯、交通、教育的发展以及社区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强化了这些发展趋势。

这样，这种短暂而剧烈的危机对各方立场形成了长期的影响。一方面，保守派加剧了对社会革命和潜在的、影响政局稳定的民族主义的担忧，另一方面，通过不断使用合乎标准的政治思想意识，将它的基本观念和宣传口号借助于中产阶级媒介传播到甚至最遥远的居住区，强化了农民旧有的道德经济和自然正义概念。在这两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温和派共和党人，则在保持他们对议会机构和法治的偏好的同时，更明确地表示他们也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中产阶级保守主义思想是之后若干年内加强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关于德国历史的独特性，已经有大量文字从1848年中产阶层要求建立一个自由国家而后失败的角度进行了描述。马克思抨击德国资产阶级“对人民的背叛”，及其“向旧社会的君权代表人物妥协”的意愿，还有他

他们没有能够捍卫其认定的真正利益并将资产阶级革命贯彻下去，而他认为英国和法国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革命。这是因为他们担心革命会威胁到他们的私有财产和现有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让君主以及工业革命前期的社会精英们维持其政治主导地位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近一些研究认为，德国中产阶级的这一狭隘思想与所处社会形势有关，而该形势导致了后来 1914 年战争的爆发，以及之后的纳粹夺权。然而，这种理论说法甚至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在我们在此前拿来作比较的那些国家中，很多工业革命前期的社会精英幸存并适应了形势发展。有产者阶层害怕社会革命，这在欧洲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现象，正如有产者总是习惯于将下层民众的不满归咎于他们自身的酗酒、无知和贪婪，对于他们希望在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中建立更大的生活保障的愿望，也不认为有什么合理性。在整个欧洲，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呼吁军队出面捍卫基督教文明，抵御“野兽们”不顾一切的“抢劫、强奸和纵火”，《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 如此描述巴黎“六月革命”中的叛乱分子。这样一种感受肯定会让有产阶级支持强势政府及其行政措施，并结合不那么正式的社会制约手段，确保将激进分子逮捕关押或者流放，宣判他们的活动为犯罪，并将它们逐出公众的生活。

独裁政府为了恢复商业信心，采取了很多措施，明显促进了185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在普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对新型交通方式和城市重建的投资刺激了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贸易和生产。逐渐呈现的繁荣景象，让大多数人从中受益，同时有助于他们与狭隘保守的政权之间的和解。在德国，大约一百万人在19世纪50年代的迁移也有助于减轻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在中欧和东欧的多数地区，尽管大地主种植园依然存在，而且细分到农民个人的土地也是联合经营的，以确保大多数农村人口在生活上仍然密切依赖于旧有的精英，然而，至少农奴制的废除缓解了他们身上的压力，甚至——在严格的条件限制下——让他们拥有了更大的独立感。各国政府也作出了重大努力，通过教育加强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对民众的基本教导规定出现在1850年的法国教育法中，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者的做法类似，都同意扩大现有的教会在教导年轻人中所起的作用，作为让年轻人融入社会的一种手段。据认为，这将确保保守主义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内化于他们心中，再加上经济一体化过程，将会大大增强民族团结意识。

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国家的威望，这使得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些措施起到了限定政治想象的边界的作用。切实可行的愿望仅限于在现有的社会和政治

体系内发生逐步的改变。事件的过程也表明，19世纪的欧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断加快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对那些当时仍受制于人口增长对资源的压力和间歇性饥荒等旧有沉重负担的社会群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各种令人不堪承受的重负导致了激烈的政治纷争，正是这些纷争让现有的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后来，由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小多了。这些因素包括更为有效的压制，在中产阶级这边则由于意识到革命的危险而愈加趋于保守，以及通过教育手段将民众更好地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之中，而且，至少在西欧诸国，通过工会组合和合法的政治活动，抗议行为逐步走向制度化。这些措施，再加上社会愈加的繁荣和生活保障（尽管存在着大范围的贫困），让革命少数派处于孤立状态——除了发生战争（如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况之外。后来，再一次出现了大范围的民众疾苦，武装力量分崩离析，以及政府信心的普遍丧失，政权已经明显出现失败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很有可能出现革命。然而，在相当大程度上，19世纪后半叶的战争就其本身而言只是1848年革命遗留之物。“革命之年”导致居住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各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大为加剧，让意大利

人对奥地利的敌意不断增加，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争夺对德影响力的竞争也更加激烈。此外，政治决策过程继续掌握在少数团体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以他们所属的狭小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利益关注为指导，并且只是偶尔考虑一下普通民众所关心的问题。由于很显然地，反对派团体本身不太可能支持革命，各国政府只是缓缓地，且在有限范围内，开始对政治改革做出更具实质性的让步，也只有这样逐步地、在有限范围内才更有可能采取镇压手段。

从很多方面看，就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言，从1845年至1846年的农业歉收开始的这场危机标志着旧制度的终结，这场危机也是1848年爆发革命并在1848—1851年间一直持续进行的主要促发因素。随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至少从18世纪初期就已开始的农业商品化进程彼此交织，加速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并产生了重大变化。1848年——就像1789年一样——是一个过渡时期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众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些矛盾已经成为经济变革的一部分。这些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政权体系的不满，它显然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更糟糕之处也许在于，在危机形势面前，政权的主要人物显得过于冷漠且不胜任。随后由于革命的失败，再加上旧精英们一味地保守退让，

让保守势力得以成功复苏。它为成功站稳脚跟的精英们发展出一套更灵活的长期生存策略提供了一个喘息的空间，该策略结合了一定的对民众让步，而这样的让步旨在维持有产者当中建立的共识，他们共同地都惧怕社会革命，同时结合社会学工程，尤其是借助于教育方式，把它作为在普通民众之间传播保守主义社会价值观的主要手段。虽然军队这一国家机器越来越被视为最终的迫不得已的镇压手段，而且在 1914 之前的这些年中几乎不怎么使用，它仍处于良好的可用状态。从这些方面看，这种制度和政策的特殊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1848 年革命以及随后出现的保守主义的退步倾向，这种结合也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典型特征。

参考书目

综 述

- [1] E. N. and P. R. Ander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7). A mine of information with useful analysis.
- [2] J. Blum, *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in Rural Europe* (1978). Useful, but with a somewhat dated legalistic approach.
- [3] J.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1982). Stimulating comparative study.
- [4] C. Calhoun, 'Industrialisation and Social Radic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12 (1983).
- [5] K. Chorley,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mains a useful analytical study.
- [6] C. H. Church, *Europe in 1830: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1983). Dependable general survey.
- [7] J. R. Gillis, 'Political Decay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1789—1848', *World Politics*, xxii (1970).
- [8] J. Godechot, *Les Révolutions de 1848* (Paris, 1971).
- [9] R. J. Goldstein,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1983). Informative, but not analytical enough.
- [10] T. H. Greene, *Compar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74). Like others of its kind: an aid to the formulation of questions.
- [11] R. Grew (ed.) *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78).

- [12] P. Jones, *The 1848 Revolutions* (1981). Includes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 [13] E. Kamenka and F. B. Smith (eds), *Intellectuals and Revolution. Social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1848* (1979).
- [14] E. Labrousse, 'Comment naissent les révolutions. 1848—1830—1789', *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1948) A classic, influential in its time.
- [15] R. Lougee, *Mid Century Revolution, 1848.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France and Germany* (1972).
- [16]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ed. D. Fernbach (1973).
- [17] L. Namier, *1848. 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1946). Another classic, but more obviously dated.
- [18] Open University,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16 units) (Milton Keynes, 1976). Mixed in quality, but overall quite an achievement—accompanied by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 [19] C.-H. Pouthas *et al.*, *Démocratique, Réaction, Capitalisms, 1848—1860* (Paris, 1983).
- [20] J. Sigmann, *1848* (1973).
- [21] A. Sked (ed.),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 (1979). Useful fo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 [22] G. Stedman Jones, 'The Mid-Century Crisis and the 1848 Revolutions', *Theory and Society*, 12 (1983).
- [23] P. N. Steams,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1974).
- [24] S. Taylor, *Social Science and Revolution* (1984).
- [25] C. Tilly and J. Rule, *Measuring Political Upheaval* (Princeton, N.J., 1965).
- [26] C., L. and R. 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975).
- [27] C. Tilly, *From Mobilisation to Revolution* (1978). Always suggestive, if excessively schematic.

- [28] M. Traugott,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risis in England and France' *Theory and Society*, 12 (1983).
- [29] E. Zimmermann, *Political Violence, Crises, and Revolution* (1983).

法 国

- [30] M. Agulhon, *The Republic in the Village. The People of the Var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Republic* (1982). A classic—linking local politics to national movements.
- [31] M. Agulhon,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1848—1852* (1983). Excellent general survey.
- [32] P. Amman, *Revolution and Mass Democracy. The Paris Club Movement in 1848 France* (1975). Thoroughly researched.
- [33] P. Bastid, *Doctrines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 seconds république*, 2 vols (Paris, 1945). The best study of politic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 [34] E. Berenson, *Populist Religion and Left-Wing Politics in France, 1830—52* (1984). A study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ts impact.
- [35] R. Bezucha, 'Masks of Revolution: A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during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in R. Price (ed.).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975). The politicis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 [36] J. P. T. Bury and R. P. Tombs, *Thiers, 1871—1877. A Political Life* (1986). A major study of a key political figure.
- [37] P. Chalmin *et al.*, *L'Armée et la seconds republique* (Paris, 1955).
- [38] J. Dagnan, *Le Gers sous la seconde république*, 2 vols, (Auch, 1928). Brings local politics to life.
- [39] T. R. Forstenzer, *French Provincial Police and the Fall of the*

- Second Republic. Social Fe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1981). Informative, but greatly exaggerates the novelty of his thesis.
- [40] W. Fortescue, *Alphonse de Lamarti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83). Reliable study of the leading politician of early 1848.
- [41] R. Gossez, 'Diversité des antagonismes sociaux vers le milieu du XIXe siècle', *Revue économique* 7 (1956). A valuable warning against simplistic sociological analysis.
- [42] R. Gossez, *Les Owners de Paris* (Paris, 1967). Not an easy read, but rewarding.
- [43] J. M. Hou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Paris, 1848', in R. Price (ed.),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975).
- [44] L. C. Jennings, *France and Europe in 1848* (1973). Especially good on policy towards Italy.
- [45] C. H. Johnson, 'Economic Change and Artisan Discontent: The Tailor's History, 1800—1848', in R. Price (ed.),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975). An insight into the politicisation of key professional groups.
- [46] R. L. Koepke, 'The Failure of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France, 1840—1848',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9 (1979).
- [47] E. Labrousse (ed.), *Aspects de la crise et de la dépressio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1846—1852* (Paris, 1956). Studi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a number of regions.
- [48] R. Liebman, 'Repressive Strategies and Working-Class Protest: Lyon 1848—1852',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1 (1980).
- [49] F. A. de Luna, *The French Republic under Cavaignac, 1848* (1969). A major study of the republic general who crushed the June insurrection.
- [50] H. Machin, 'The Prefect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February 1848 to December 1851', in R. Price (ed.), *Revolution and*

-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975).
- [51] R. W. Magraw, 'Pierre Joigneaux and Socialist Propaganda in the French Countrysid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0 (1977–1978).
- [52] T. Margadant,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The Insurrection of 1851* (1979). Invaluable, al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isation theory is not always convincing.
- [53] P. McPhee, 'The Seed-Time of the Republic: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Pyrénées-Orientales, 1848–51', *Politics and History* (1976).
- [54] J. M. Merriman, *The Agony of the Republic. The Repression of the Left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1848–1851* (1978). Excellent survey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repression.
- [55] R. Price, *The French Second Republic: A Social History* (1972). Not for me to comment! See R. Gildea, 'scholarly and reliable' in *Barricades and Borders. Europe, 1800–1914* (Oxford, 1987).
- [56] R. Price (ed.).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975). Contains a range of useful essays.
- [57] R. Price (ed.), *1848 in France* (1975).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with an introduction.
- [58] R. Price, 'Techniques of Repression: the Control of Popular Protest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Historical Journal*, 25 (1982).
- [59] R. Price, 'Poor Relief and Social Crisis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3 (1983).
- [60] R. Price, 'Subsistence Crises and Popular Protest', in *The Modernisation of Rural France* (1983). Examines the last major subsistence crises, and explains their disappearance.
- [61] W. H. Sewell Jr.,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1980). Stresses the continuities in work organisation and attitudes.

- [62] M. L. Stewart-McDougall, *The Artisan Republic. Revolution, Reaction and Resistance in Lyon, 1848—1851* (Gloucester, 1984). Important study of a city with an old radical tradition.
- [63] C. Tilly, 'The People of June' in R. Price (ed.),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975).
- [64] A. de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1986). The views of an intelligent contemporary observer.
- [65] M. Traugott, *Armies of the Poor. Determinants of Working Class Participation in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 1848* (1985). Considers why workers fought on both sides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 [66] A.-J. Tudesq, *Les Grands notables en France (1840—1849): études historique d'une psychologie sociale*, 2 vols (Paris, 1964). A massive study of social elites.
- [67] A.-J. Tudesq,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0 décembre, 1848* (Paris, 1965). Superb electoral study.
- [68] P. Vigier, *La Seconde république dans la région alpine*, 2 vols (Paris, 1963).
- [69] P. Vigier, *La Seconde république* (Paris, 1967).
- [70] P. Vigier, 'Le Bonapartisme et le monde rurale', in K. Hammer and P. C. Hartmann (eds), *Der Bonapartismus. Historisches Phänomen und politischer Mythos* (Munich, 1977).
- [71] P. Vigier, *La Vie quotidienne en province et à Paris pendant les journées de 1848* (Paris, 1982). A series of local vignettes.
- [72] E. Weber, 'The Second Republic, Politics and the Peasant',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xi (1980).
- [73] E. Weber, "'Comment la politique vint aux paysans": A Second Look at Peasant Politiciz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1982).
- [74] V. Wright, 'The Coup d'état of December 1851: Repression

and the Limits to Repression', in R. Price (ed.),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975).

德 国

- [75] J. Bergmann, 'Ökonomische Voraussetzungen der Revolution von 1848. Zur Krise von 1845 bis 1848 in Deutschland' in H. U. Wehler (ed.), *200 Jahre amerikanische Revolution und moderne Revolutionsforschun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976). Very useful survey of the pre-revolutionary crisis.
- [76] J. Bergmann, 'Soziallage, Selbstverständnis und Aktionsformen der Arbeiter in der Revolution von 1848', in H. Volkmann and J. Bergmann (eds), *Sozialer Protest* (Opladen, 1984).
- [77] J. Bergmann, 'Die Revolution von 1848 als Modernisierungskrise. Zur Vor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 aus modernisierungstheoretischer Sicht', in J. Bergmann *et al.*, *Arbeit, Mobilität, Participation, Protest* (Opladen, 1986).
- [78] H. Best, *Wirtschaftskrise und Revolution. Handwerker und Arbeiter 1848/1849* (Stuttgart, 1986). Importance of period for emerging working class.
- [79] H. Best, *Interessenpolitik und nationale Integration 1848/49* (Göttingen, 1980). Effective analysis of competing interest groups.
- [80] H. Best, 'Analysis of Content and Contex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The Case of Petitions to the Frankfurt National Assembly, 1848/49', in J. M. Clubb and F. L. Schauch (eds), *Quantitative-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 (Stuttgart, 1980).
- [81] D. Blackbourn and G.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1985). Controversial contribution to a major debate.

- [82] D. Blasius,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und Kriminalität. Zur Socialgeschichte Preussens im Vormärz*. (Göttingen, 1978). Useful for background to revolution.
- [83] H. Bleiber, 'Bauern und Landarbeit in der bürgerlich-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 von 1848/49 in Deutschland',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7 (1969). Good survey of rural unrest.
- [83a] W. Boldt, *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r Parteiwesens: Factionen, politische Vereine und Parteien in der Revolution 1848* (Paderborn, 1971). The formation of parties as seen by the press.
- [84] W. Boldt, 'Konstitutionelle Monarchie oder parlamentarische Demokrati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16 (1973).
- [85] M. Botzenhart, *Deutscher Parlamentarismus der Revolution zeit 1848—1850* (Düsseldorf, 1977).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 [86] J. Calliess, *Militär in der Krise. Die bayerische Armee in der Revolution 1848/49* (Boppard am Rhein, 1976). Insights into the key question of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 [87] R. Canevdi, 'The "False French Alarm": Revolutionary Panic in Baden, 1848',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8, (1985).
- [88] D. Dowe, *Aktion und Organisation. Arbeiterbewegung, soz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in der preussischen Rheinprovinz, 1820—1852* (Hannover, 1970). Important study of major centre of radicalism.
- [89] J. Droz, *Les Révolutions allemandes de 1848* (Paris, 1957). Massive general study which takes account of regional variations. Insufficient analysis.
- [90] F. Eyck, *The Frankfurt Parliament, 1848—1849* (1968). Solid, reliable study.
- [91] H. Fischer, 'Konservatismus von unten Wahlen im ländlichen Preussen 1849/52—Organisation, Agitation, Manipulation',

- in D. Stegmann, B.-J. Wendt and P.-C. Wilt (eds), *Deutscher Konservat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onn, 1983). Good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reaction.
- [92] M. Gailus, 'Soziale Protest bewungen in Deutschland 1847–1849' in Volkmann and Bergmann (eds), *Sozialer Protest* (1984).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forms of popular protest.
- [93] J. R. Gillis,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Crisis, 1840–1860* (1972). A means of understanding both the weaknesses and fundamental strength of the Prussian state.
- [94] D. Groh, 'Le "Sonderweg". De l'histoire allemande: mythe ou réalité', *Annales ESC*, 38 (1983).
- [95] D. Grünthal, *Parlamentarismus in Preussen 1848/49–1857/58* (Düsseldorf, 1982). A substantial constitutional and parliamentary history—considers the workings of the three-class system.
- [96] E. Hahn, 'German Parliamentary National Aims in 1848–49: A Legacy Reassessed',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3 (1980).
- [97] F. S. Hamerow, 'History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0 (1954).
- [98] F. S.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1958). Still an useful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
- [99] F. S. Hamerow, '1848', in L. Krieger and F. Ster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1968).
- [100] R. Hoppe and J. Kuczynski, 'Eine Berufs- bzw. auch Klassen- und Schichtenanalyse der Märzgefallenen 1848 in Berlin', i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iv (1964).
- [101] H.-G. Husung, *Protest und Repression im Vormärz. Norddeutschland zwischen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Göttingen, 1983). Setting the revolution with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 [102] R. Koch, 'Die Agra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48', in D.

- Langewiesche (ed.).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848/49* (Darmstadt, 1983).
- [103] D. Langewiesche, 'Gesellschafts—und verfassungspolitische Handlungsbedingungen und Ziel vorstellungen europäischer Liberaler in der Revolutionen von 1848', in W. Schieder (ed.), *Liberalismus in der Gesellschaft des deutschen Vormäz* (Göttingen, 1983).
- [104] D. Langewiesche, *Liberalismus und Demokratie in Württemberg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ichsgründung* (Düsseldorf, 1974). An important regional study.
- [105] D. Langewiesche, '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n Parteien. Partei, Fraktion und Verein in der Revolution von 1848/49',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4 (1978).
- [106] D. Langewiesche, 'Republik, Konstitutionelle Monarchie und "Soziale Frage". Grundprobleme det deutschen Revolution von 1848/49',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30 (1980).
- [107] D. Langewiesche,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848/49 und die vorrevolutionäre Gesellschaft: Forschungsstand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s', *Archivfür Sozialgeschichte*, 21 (1981).
- [108] D. Langewiesche (ed.)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848/49* (Darmstadt, 1983). Good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most aspects of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 [109] A. Lüdtke, 'The Role of State Violence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Example of Prussia from 1815 to 1848', *Social History*, 3 (1979).
- [110] D. J. Mattheisen, 'History as Current Events: Recent Works o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 (1983).
- [111] J. Mooser, *Ländliche Klassengesellschaft, 1770—1848* (Göttingen, 1985). A major study of the Westphalian peasantry.

- [112] P. H. Noyes, *Organisation and Revolution. Working Class Associations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49* (1966). A major study, well worth persevering with.
- [113] L. O'Boyle, 'The Democratic Left in Germany, 184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iii (1961).
- [114] W. J. Orr, 'East P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3(1980).
- [114a] K. L. von Prittwitz, *Berlin 1848. Das Erinnerungswerk des Generalleutnants Karl Ludwig von Prittwitz und andere Quellen zur Berliner Märzrevolution und zur Geschichte Preussens um die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1985). New insights into military failure.
- [115] W. Real, *Die Revolution in Baden, 1848/1849* (Stuttgart, 1983). Good study of a major centre of radical agitation.
- [116] H. Rohling, 'Das Sozialprofil der Hanover Turnerwehr 1849', in Volkmann and Bergmann (eds), *Sozialer Protest* (Opladen, 1984).
- [117] H.-J. Rupieper, 'Die Sozialstruktur der Trägerschichten der Revolution 1848/49 am Beispiel Sachsen', in H. Kaelble *et al.* (eds), *Probleme der Modernisierung in Deutschland* (Opladen, 1978).
- [118] W. Schieder, 'Die Rolle der deutschen Arbeiter in der Revolution von 1848/49', in W. Klötzer *et al.*, *Ideen und Strukture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1848* (Frankfurt a M., 1974).
- [119] J.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8). Major study setting 1848 liberalism with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 [120] E. Shorter, 'Middle Class Anxiety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 (1968—1969).
- [121] W. Siemann, *Die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Die*

Bedeutung der Juristendominanz (Berne, 1976).

- [122] W. Siemann, *Restauration, Liberalismus und nationale Bewegung (1815–1870)* (Darmstadt, 1982).
- [123] W. Siemann,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848–1849* (Frankfurt, 1985). Useful synthesis.
- [124] R. Stadelman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1848 Revolution* (Athens, Ohio, 1978).
- [125] R. Tilly, 'Popular Disorde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 (1970–1971).
- [126] V. Valenti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von 1848–1849* 2, vols (Berlin, 1931). Old but still useful, as is the one-volume English edition.
- [127] H. Volkman and J. Bergmann (eds), *Sozialer Protest. Studien zu traditioneller Resistenz und Kollektiver Gewalt in Deutschland vom Vormärz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Opladen, 1984).
- [128] M. Walker, *German Home Towns. Community, State, General Estates* (Ithaca, N.Y., 1971). Useful for setting the context for political activity.
- [129] R. We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Sozialer Struktur und politischer Ideologie des Kleinbürgertums in der Revolution von 1848/49* (1965).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complexities of socio-political analysis.
- [130] R. Wirtz, 'Die Begriffsverwirrung der Bauern im Odenwald 1848', in D. Puls (ed.), *Wahrnehmungsformen und Protestverhalten* (Frankfurt a M, 1979).
- [131] G. Wollstein, *Das 'Gross deutschland' der Paulskirche: Nationale Ziele in der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1848–1849* (Düsseldorf, 1977). Together with the next title, this provides an important study of nationalism.
- [132] G. Wollstein, *Mitteleuropa und Grossdeutschland—Visionen*

der Revolution 1848/49. Nationale Ziele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1980).

哈布斯堡帝国

- [133] R. A. Austensen, 'The Making of Austria's Prussian Policy, 1848—1852', *Historical Journal*, xxvii (1984).
- [134] I. Deak, 'Destruction, Revolution, or Reform: Hungary on the Eve of 1848',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xii—xiii (1976—1977).
- [135] I. Deak,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1979).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events.
- [136] I. Deak, 'An Army Divided: The Loyalty Crisis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in 1848—1849', *Jahrbuch des Instituts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8 (1979).
- [137] R. R. Florescu, 'Debunking a Myth: The Magyar—Romanian Struggle of 1848—1849',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xii—xiii (1976—1977).
- [138] G. Handlery,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in the Context of Backwardness: Hungary's 1848',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6 (1972).
- [139] B. H. Király (ed.). *East Central European Society and War in the Era of Revolutions, 1775—1856* (New York, 1984).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articles.
- [140] A. Klima,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of 1848—1849 in Central Europe', in R. Porter and M. Teich, *Revolution in History* (1986).
- [141] S. Z. Pech, *The Czech Revolution of 1848* (Chapel Hill, N.C., 1969). Sound and informative.
- [142] J. Polisensky, *Aristocrats and the Crown in the Revolutionary Year 1848* (Albany, N.Y., 1980). Marxist view of the Czech revolution.

- [143] R. J. Rath, *The Viennese Revolution of 1848* (Austin, Texas, 1957). Thorough—wears his conservative political views on his sleeve.
- [144] R. L. Rudolph, 'Economic Revolution in Austria? The Meaning of 1848 in Austrian Economic History', in J. Komlos (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Habsberg Monarc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5).
- [145] A. Sked, *The Surviva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Radetzky, the Imperial Army and the Class War, 1848* (1979). Excellent on the role of the army in Lombardy-Venetia.
- [146] István Széchenyi, 'Miklós Wessélenyi, Lajos Kossuth and the Problem of Romanian Nationalism',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xii—xiii (1976—1977).
- [147] J. F. Zacek, 'Czech Attitudes toward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xii—xiii (1976—1977).

意大利

- [147a] D. Demarco, 'Le rivoluzioni italiano de 1848', in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Milan, 1950).
- [148] A. M. Ghisalberti, *Momenti e figure del Risorgimento romano* (Milan, 1965).
- [149] P. Gihborg, 'Peasant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Venice and Veneto, 1848', *Historical Journal*, 17 (1974).
- [150] P. Ginsborg, *Daniel Manin and the Venetian Revolution of 1848—1849* (1979). Very good in depth study.
- [151] B. F. Griffith, 'Italian Nationalism and Particularities in 1848: The Example of Tuscany', in H. T. Parker (ed.), *The Consortium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Proceedings*. (1975).
- [152] H. Hearder,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Republic, 1848—1849', *History*, lx (1975).

- [153] H. Hearder, *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isorgimento* (1983). Informative, perhaps a little lacking in analysis.
- [154] F. delta Peruta, *Democrazia e socialismo nel risorgimento* (Rome, 1977).
- [155] C. Ronchi, *I democratici Fiorentini nella rivoluzione del' 1848—1849* (Florence, 1963).
- [156] S.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 1700—1860: the Social Constraints of Political Change* (1979). Set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英 国

- [157] H. M. Boot, *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47* (Hull, 1984). Shows why the economic crisis was less severe in Britain than elsewhere.
- [158] J. Epstein and D. Thompson (eds),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982). Excellent collection of articles.
- [159] D. Goodway, *London Chartism, 1838—1848* (1982). Central to an understanding of events in the capital.
- [160] F. C. Mather, *Public Order in the Age of the Chartists* (Manchester, 1959). Useful study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authorities.
- [161] G. Rudé, 'Why was there no Revolution in England in 1830 or 1848?' in M. Kossok (ed.), *Studien über die Revolution* (Berlin, 1971).
- [162] J. Saville, *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 (1987). A major reassessment of the Chartist threat and of government policy.
- [163] M. I. Thomas and P. Holt, *Threats of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89—1848* (1977). Assesse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menace of revolution.

- [164] D. Thompson, *The Chartists* (1984). Good synthesis of recent work.
- [165] H. Weisser, 'Chartism in 1848: Reflections on a non-Revolution', *Albion*, 13 (1981).

其 他

- [166] D. R. Headrick, 'Spain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6 (1976).

地 图

地图 1 1848 年的欧洲

地图 2 工业化发展：

1815 年的欧洲与 1875 年的欧洲

地图 3 1848 年的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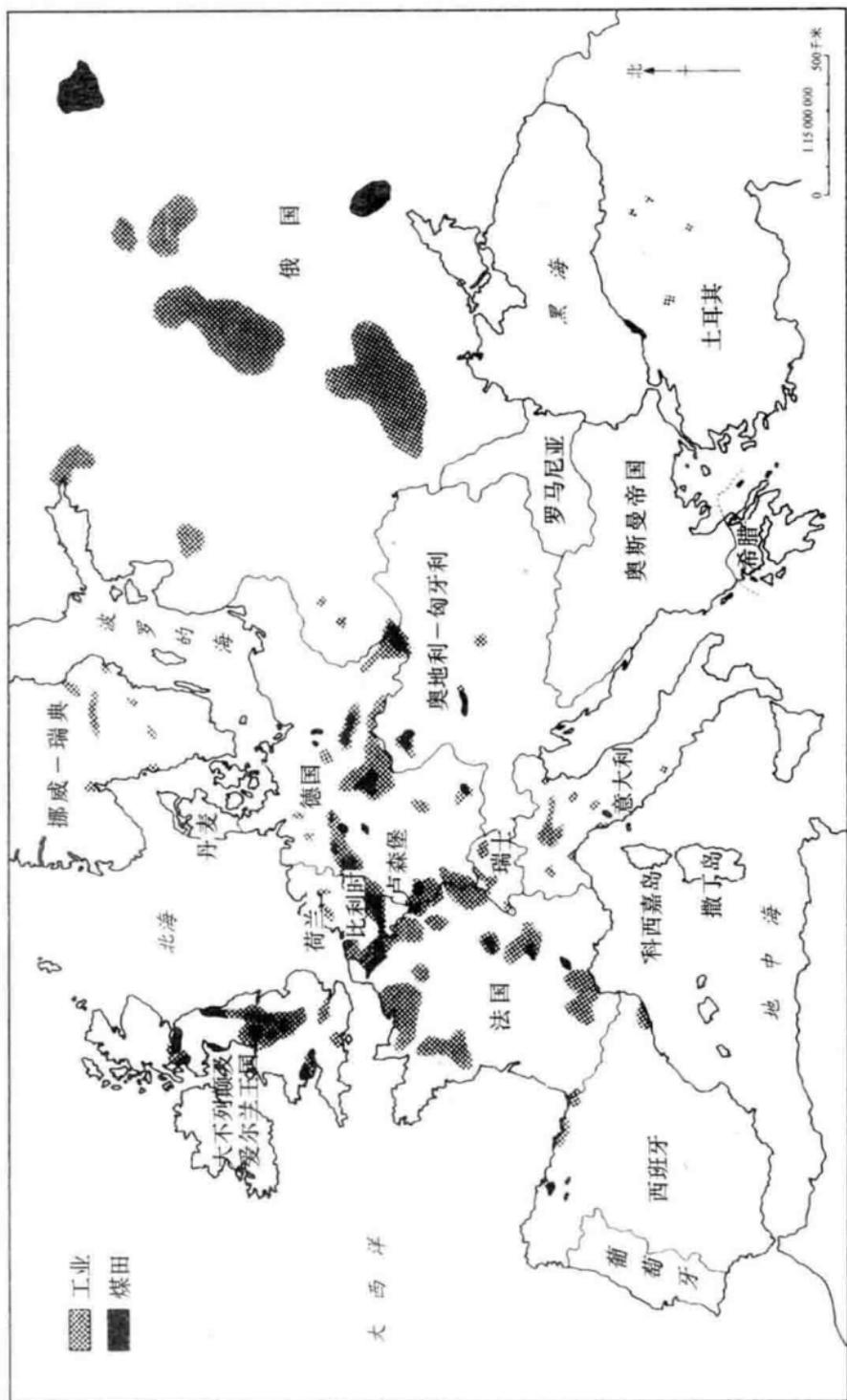
地图 4 1848 年的意大利

地图 5 1848—1851 年的哈布斯堡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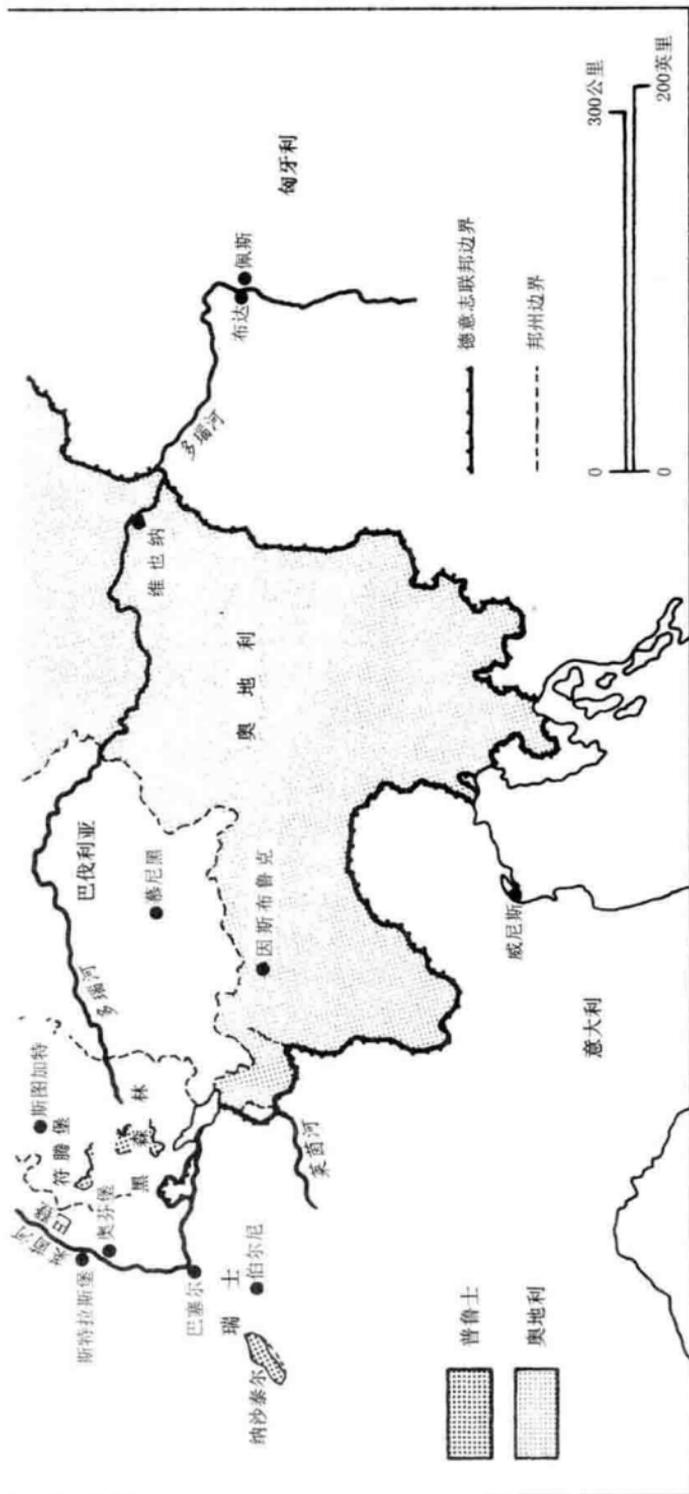
地图 6 1848 年 6 月的巴黎起义

地图 7 1848 年欧洲主要的土地所有制类型

地图 8 1851 年 12 月法国发生起义的地区



B 1875 年的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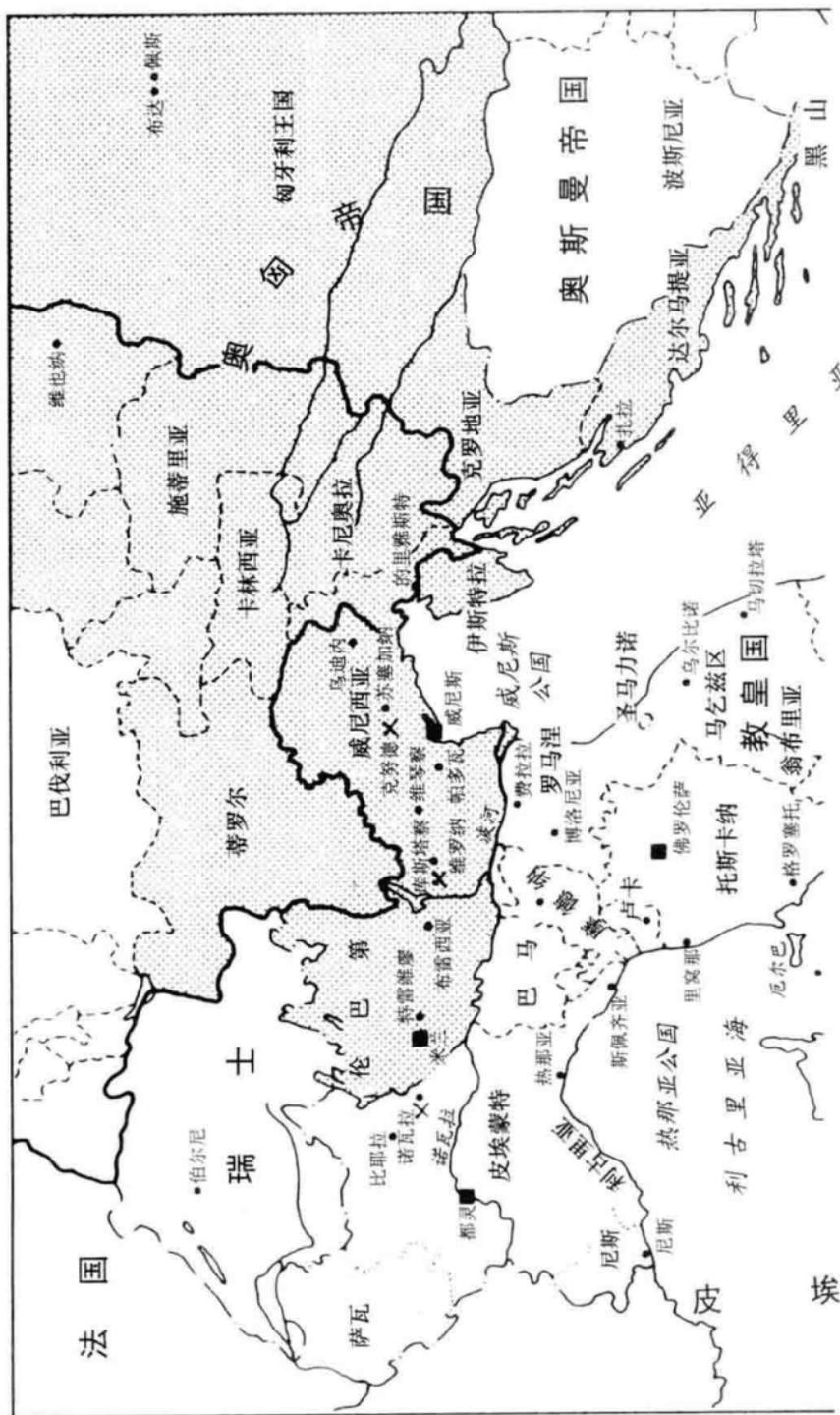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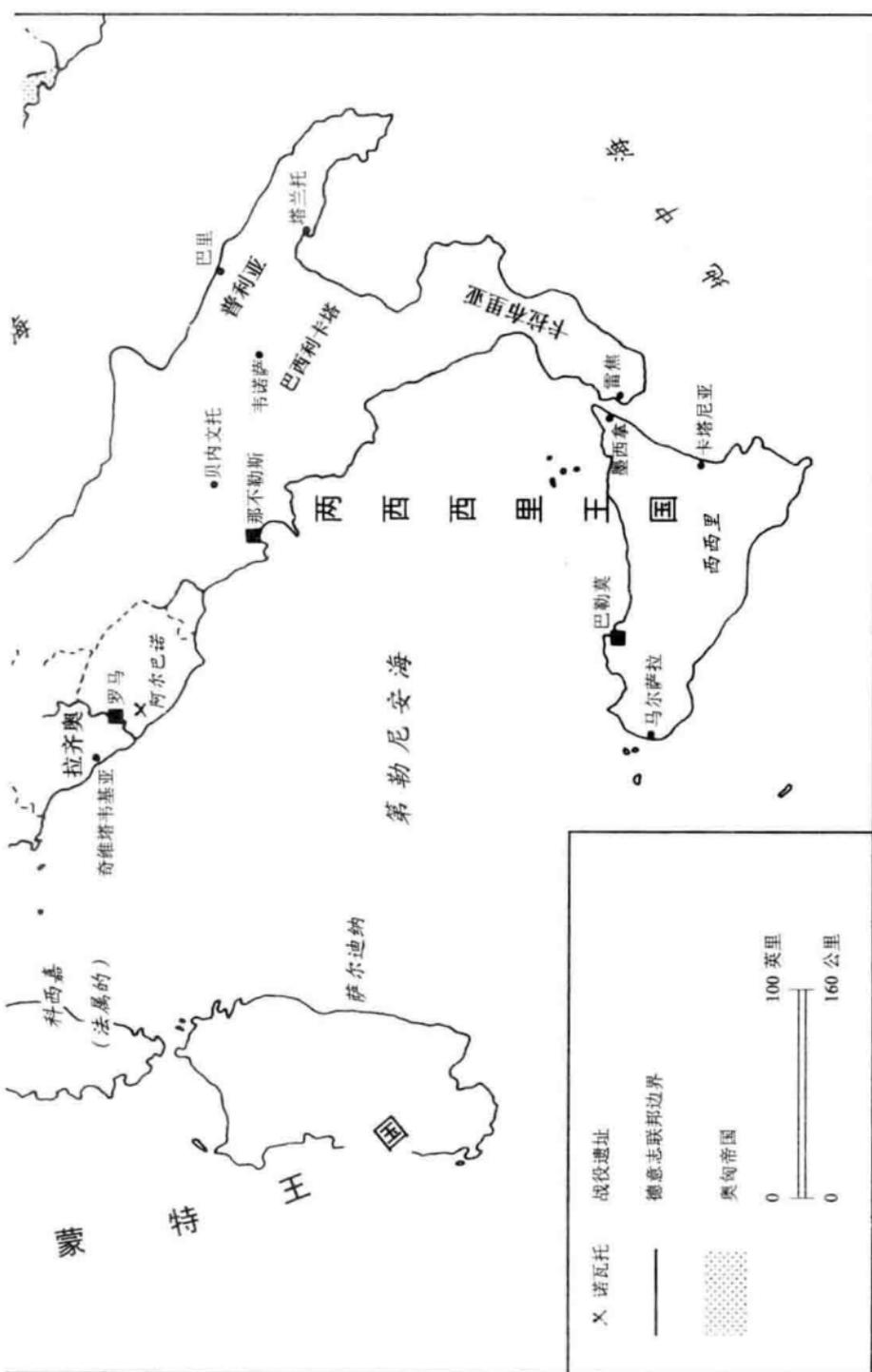
有些公国在地理上被拆分：
 巴伐利亚和 (a) 普法尔茨
 奥尔登堡和 (b) 地区
 汉诺威和 (c) 地区

- 图灵根各公国：- (简化)
- 1 萨克森-魏玛
 - 2 萨克森-迈宁根
 - 3 萨克森-科堡-哥塔
 - 4 萨克森-阿尔滕堡
 - 5 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
 - 6 施瓦茨堡-鲁道尔施塔特
 - 7 鲁斯-施莱茨
 - 8 鲁斯-格雷茨

地图 3 1848 年的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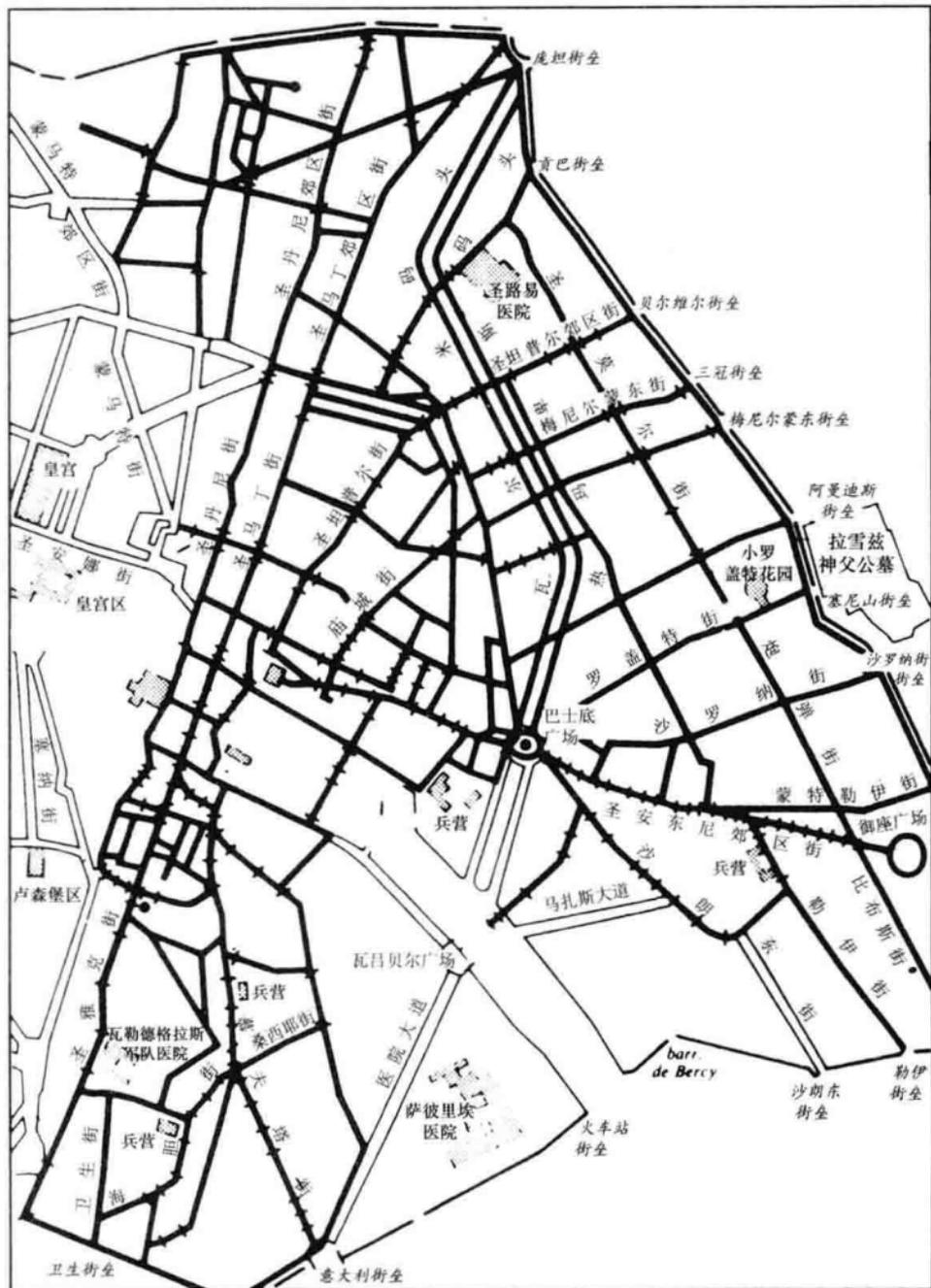
来源: H.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Eyre & Spottiswoode,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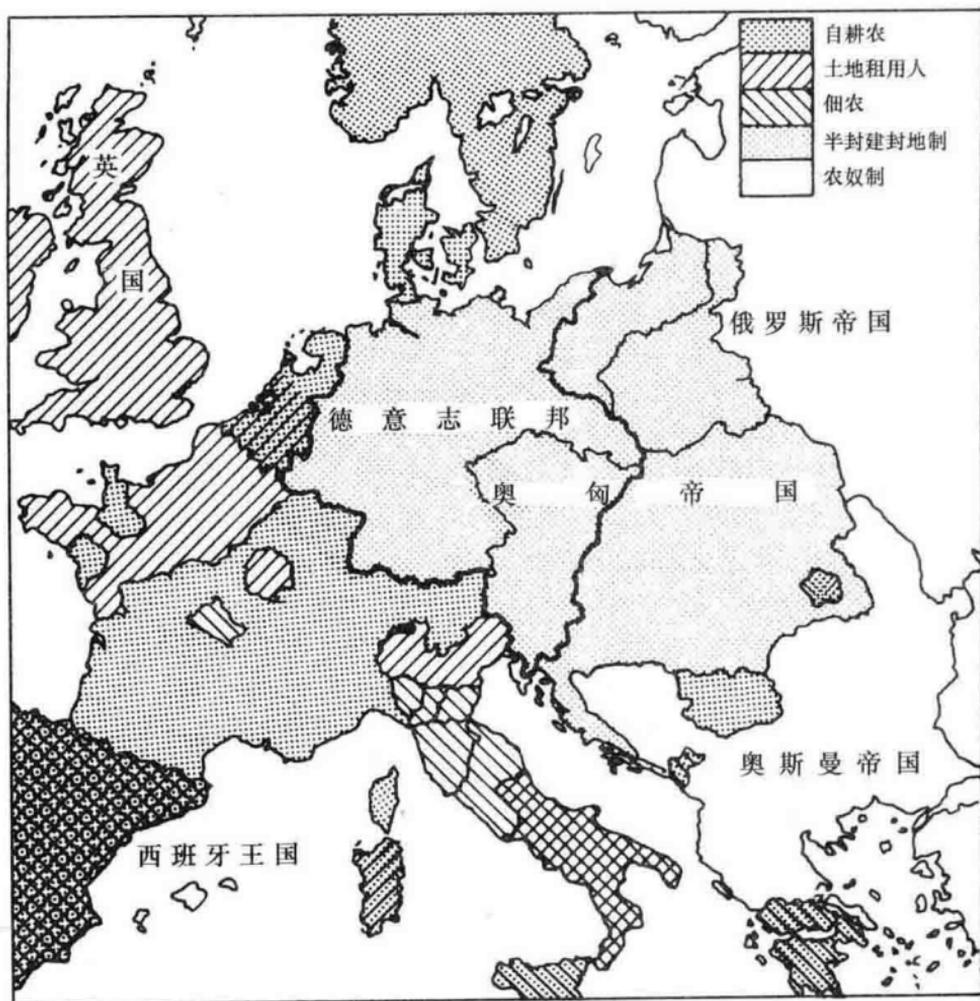
地图 4 1848 年的意大利

来源: Open University,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Unit 2, Milton Keynes,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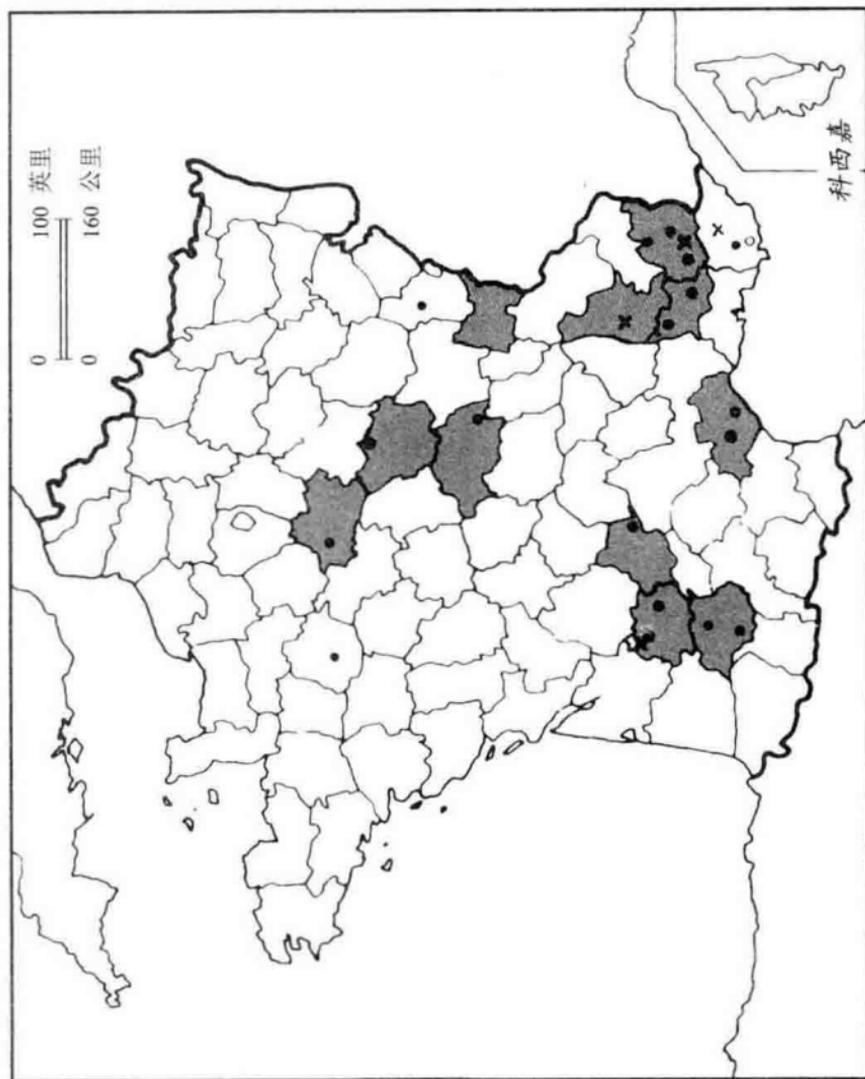
地图 6 1848 年 6 月的巴黎起义

来源: M. Agulhon,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1848-185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地图 7 1848 年欧洲主要的土地所有制类型

来源: Open University,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Unit 2, Milton Keynes, 1976)



地图 8 1851 年 12 月法国发生起义的地区

来源：Open University,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Unit 2, Milton Keynes, 1976)